



2010 年 10 月 10 日第 18 期

总第五十九期

2008 年 9 月 13 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清华大学文革专辑

编者说明：

清华大学，是文革中的一个独特典型：刘少奇派其夫人王光美到该校指导工作组，毛泽东派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到该校发动群众，批判工作组，中共高层的分歧在该校直接诉诸群众并运动群众；1968 年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就在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眼皮底下发生，却因毛泽东秘而不宣的“部署”而无人干预，听任其酿成死伤若干“倒下的英才”的惨剧；毛泽东“七二七”向清华大学派出变相工作组——工宣队的举措，则成为其宣告文革群众造反运动终结的标志性事件；清华大学工宣队的“清队”经验成为毛泽东向全国推广的“六厂二校”经验之首；清华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的两封汇报信成为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导火索……在文革的不同阶段，清华大学几乎都起着示范性的作用，成为毛泽东的一块“试验田”。研究文革，清华大学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近年来，当年清华大学的校友们越来越多地开始了对那段历史的回顾与反思，陆续出版了好几本颇有分量的回忆录及资料书，并在校友网上展开了十分热烈的争论。和其他大学相比，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虽然争论双方不时会流露出一些当年的派性，但是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反思那段无论对中华民族还是对个人来说都是大灾难、大损失的历史。

本专辑承蒙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协助组稿，谨致谢忱。

本期目录

蓦然回首

[王大定 我在清华大学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叶志江 关于在清华武斗中当“俘虏”的一些经历——给《倒下的英才》作者唐金鹤的信](#)

争鸣

[陆小宝 流着眼泪剥洋葱——《倒下的英才》再版后记](#)

[沈 昆 陆小宝校友“剥洋葱”的误区](#)

书评与序跋

[唐少杰 进一步认识和研究“蒯大富现象”——要宝钟著《蒯大富》序言](#)

小资料

[渔歌子辑录 毛泽东、周恩来、陶铸谈蒯大富](#)

编读往来

- 1、[管宁/陈远焕来电来信纠错](#) 2、[阎长贵纠错](#)
3、[周津平提供北京四中教师苏亭午的资料](#) 4、[荷兰庄菁瑞来信](#)
-

【蓦然回首】

按：本文作者王大定，是文革时清华大学化 902 班学生，蒯大富的同班同学。在文革中参加了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将此文推荐到清华校友网上的是他的同班同学陈桢祥。陈当时属于与他对立的“保皇派”（后来则成为“逍遥派”）。本文中括号里的“陈注”即陈桢祥对一些史实的不同记忆。本刊对王文与陈注均有删节。

[我在清华大学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王大定

1966年6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的大学学业中断了。我所在的班——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6902班（当时简称为“化902”）成了全校最有名的班级。班上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蒯大富。我也被卷进了文革旋涡，当了“造反派”。

一、文革前的政治气氛

文革之前，国内的政治气氛已很浓重。中苏论战，发表了“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二评”，“三评”，直到“九评”。学生们相信了宣传，苏联“变修”了，我们要“防修反修”。之前，我们都知道南斯拉夫已变成了“修正主义”。另一个重要的政治运动，就是全国大学毛主席著作。自林彪主持解放军工作之后，全军学毛著，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形成一个学习的高潮。清华“突出政治”也抓得很紧。当时，我对学习毛著是很认真的，毛选四卷通读不止一遍。我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政治课代表，当然更得带头学。而现在看来，那时的“学习高潮”，实际上是搞个人崇拜，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个人专断，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文革前奏，是《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吴晗的这个历史剧是为彭德怀翻案。接着就是批判北京市委的“三家村”，即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后来我们知道，这是毛主席向北京市委动刀。顺便提一下，邓拓的女儿邓小兰，是我同系、同级的同学。邓拓是含冤自杀的。尽管他一生忠于毛泽东，毛泽东仍把他推向绝路。吴晗的一个外甥女叫做宋滇，她与我同系，高一年级，担任我这一年级的政治辅导员。文革中她的家族受害，她仍然靠拢“造反派”，我猜想她是由于害怕，所以违心地靠近这一派。到毕业分配，她被发配到沙城农场，那是当时“黑五类”子女去的地方。

二、文化大革命开始，造校党委的反，工作组进校

文化大革命开始，清华校园内出现了“揭发”彭真的大字报，说彭真是混进中央的修正主义分子。这时我才注意到，报纸上很长一段时间彭真没露面了。记得1965年，北京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曾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演出节目，清华担任最后一幕戏叫“北京学生支援全国学生运动”，（陈批：应该是“中国学生

支援世界革命”，我当年也参加了此次演出。布景投影的是天安门，我们扮演首都学生民兵，手拿步枪跳各种动作，与穿各种民族服装的学生一起支持世界革命。）我班全班（陈批：我记得是一部分）同学参加了这一演出，扮演的是在天安门前游行的学生队伍。谢幕时，彭真上台来与演出的学生合影，前排的学生还和彭真握手。文革开始，人们就知道，北京市委被改组了，彭真被撤职，李雪峰调任市委书记。毛主席说原北京市委是“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

1966年6月2日那天，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那篇著名大字报（即被毛主席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清华园就混乱起来了，（陈批：当天我们许多同学就走到北大，支持北大革命行动。我记得，当时聂元梓就与蒯大富在北大某食堂前临时搭的台上第一次握手。）学生停课闹革命、纷纷写大字报。部分大字报直接批判清华党委执行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忆那时主要论点有：北大执行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难道清华不是？清华沿袭欧美教学方式，建国后作院系调整是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教材也是参照苏联的教材编写的，苏联已经变修，清华的教育路线也就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路线。党委书记蒋南翔执行的是“教授治校”——“108将”治校（据说清华有108位教授）。先前在反右斗争中，蒋南翔打垮了治校的教授这一股强大势力，划定了很多右派；他站稳脚之后又分批为右派摘帽子，因为教学最终还得教授担当主导作用。文革来了，学生们又利用反右斗争作借口用来批判蒋南翔。还有一个观点是说蒋南翔贬低、反对毛泽东思想，理由是蒋南翔把毛泽东思想称作马列主义“高峰”，而林彪称之为“顶峰”，高峰没有顶峰高，所以是贬低、反对毛泽东思想。（陈批：我印象中当时大字报争论主要围绕校党委姓“马”还是姓“修”的问题。）

这些观点，现在看来是多么荒唐可笑，但当时却是堂而皇之的响当当的观点，谁也不敢反驳。

我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因为《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突出政治要落实到思想革命化上》（批判罗瑞卿搞军队“大比武”是不突出政治），我看了这社论，联系到清华推行的“突出政治要落实在业务上”，就写大字报说清华也不突出政治。现

在看来，“突出政治要落实在思想革命化上”，完全是一种空论。当时我头脑发热，也就写了这张大字报——其实，我自己一向也是注重业务学习的。

值得一提的是，最早写大字报反清华校党委的学生，是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之子贺鹏飞、李井泉之子李黎风、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等一批高干子女。一般学生哪敢写反党委的大字报？反右斗争的教训铭刻人心。文革进一步的发展，这些高干都被打倒，其子女们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些子女为什么在开始时那么积极？我猜想，是这些高干都上当受骗了，他们以为揪走资派只到彭真为止，而又看到毛泽东要造教育界的反，蒋南翔当过彭真的秘书，所以让他们的子女带头行动，迎合毛泽东，又可以使子女获得政治资本。有一种观点是：刘少奇为了保自己而抛出了蒋南翔，是政治上的舍车保帅。

大字报使全清华一片混乱，蒋南翔也组织人写大字报，肯定校党委的成绩以自卫。但是自卫没起到作用，6月12日，北京新市委李雪峰派工作组进驻清华园，宣布蒋南翔停职检查。这就意味着蒋南翔及清华校党委被打倒（这里注意，是被工作组打倒的，不是学生们打倒的），学校权力归工作组。成立了“清华大学文革领导小组”，校一级组长是贺鹏飞，还有刘涛、李黎风等人。各系各班都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文革小组。到我班的工作组人员叫张茜薇，（陈批：张是工化系工作组副组长，当时是化工部下属某研究所所长。组长是化工部某司副司长，女性，资格顶老的，当时就听说她配有专车。我班工作组成员是北京某纺织厂的一位车间党支部书记，男性。）她是领导过海陆丰起义的烈士张太雷的女儿。我班文革小组组长是蒯大富，我是成员之一。

这样，以对党委的态度，全校师生第一次被划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或称“反蒋派”和“保蒋派”。（陈批：我班在批判校党委时分成“十七人小组”和“十一人小组”。我当时是“十七人小组”的，是“保蒋派”，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去保蒋南翔。当时清华像黄报青那样死保蒋的人屈指可数，绝大多数师生是听党中央的，如《人民日报》社论所号召的“拿起批判的武器”。我们觉得应该先批判后下结论——一切结论都在调查研究之后。他们“造反派”也许“先知先觉”，已经断定校党委是姓

“修”的。工作组进校了，我们也就成为“保皇派”。)自此，党委成员都被称为“黑帮”人物，受到大会小会批判（这里注意，第一阶段的“造反派”是贺鹏飞、刘涛、李黎风等高干子女）。

这段时间北京各高校的情况很相似，党委都被打倒，都陆续派了工作组，成立了以高干子女为主的文革领导小组。全国各地陆续掀起了造党委“反”之风。

现在回想：当时为什么那么多学生参加造反？是什么动机？这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氛，上上下下的政治教育，都说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些说教深入人心。学生们积极拥护中央决定，怀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崇拜），凭着一股政治热情参加运动，起来“造反”。所以，实情绝不是现在社会上笼统认为的，是什么一批坏分子起来造反。例如，刘涛、贺鹏飞这批高干子女就是最早的造反派。再例如，当时我班十二个（陈批：应是 11 人）给党委写大字报的同学，十一个是团员（包括我，当时的团支部宣传委员），一个是党员（当时的班长）。当然，学生的这种热情是很幼稚的，盲目的，历史证明这种热情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了党内权力斗争的工具。

三、怀疑工作组和“反蒯”斗争

清华大学在工作组和文革小组的领导下，大力批判蒋南翔为代表的校党委，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可是，没几天传出一阵风：工作组竟是旧北京市委派来的。有个姓王的学生首先贴出怀疑工作组的大字报。这股风从何而来？当时我不理解。现在有一种解释，是中央文革小组散布出来的。但是，也不一定如此。当时，时兴一句话：要“怀疑一切”，据说是马克思说的，学生中也容易产生怀疑工作组的看法。

我班的蒯大富迎合了这股怀疑风，对工作组提了不少疑问。（陈批：关键是蒯当时提出向工作组“再夺权”！这还得了？！——蒯在化 901 班刘才堂的大字报上用钢笔批注：“过去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把它夺了过来。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我们革命造反派就要想一想这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

再夺权！”按当时正统的思维方式就是反革命。）大概是 6 月 22 日吧，全班被召集开会，除张茜薇外，（陈批：我记得张当时没有来）到会还有一位工作组人员，不知姓名，显然比张的职位高。（陈批：当时我们接到系工作组通知，说王光美要到我们班来听取大家对工作组的意见。当时我们在三院的教室打扫卫生，课桌围成一圈，大家都非常兴奋。）他们说，知道化 902 班的同学对工作组意见较多，特来听取意见。会上多个同学发言，蒯大富发言最多。（陈批：蒯是主持会议，并没有对工作组提意见。因为当时王光美没有来，她的秘书及校、系的几个工作组组员来。蒯等人认为这是工作组的阴谋，想利用王来套取他们的意见。王光美的秘书是一位带黑框眼镜、姓“崔”、大约 40 来岁的女士。第二天，在阶梯教室旁的石椅边与我等三人说：“当时蒯等人都不说话，在底下互相递条子。”听到此话我深感当时工作组对蒯等已经很注意了，是有备而来。因为当时我在会上给工作组提的意见是最激烈的，但事后对我这个“保皇派”并没有怎么样。）当时提了些什么意见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我没发言。第二天，清华轰动了。原来，蒯大富在晚上集合了我班十位同学（十位中没有我）写了大字报，《叶林，这是怎么回事？》（陈批：应是《叶林同志，这是为什么？》）一式二份贴在两个地方以供更多的人看。大字报上称，工作组到化 902 班开会，是套取学生的情报，因此质问清华工作组组长叶林。（陈批：当时我们都还不知道王光美已是工作组的顾问。）此大字报造成了清华园更大混乱，工作组难以再继续维持工作了，不得不组织全校“大辩论”，以期批倒蒯大富，压制住怀疑工作组这股风。1966 年 6 月 24 日晚，在大礼堂，工作组安排了我班部分学生为一派，蒯大富等人为一派进行辩论。观看的学生挤满了大礼堂，可以想象，对工作组持怀疑态度的人挤进来的较多，所以工作组控制不了会场，我班的学生被安排坐在中间前两排。这次会上我自己跳上去说：“蒯大富这个大字报我是不赞成的，而工作组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是挑动学生斗学生。”（陈批：第二天王光美的秘书老崔对我们说：王

光美当时在强斋听礼堂辩论实况，评价说完全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民主”。)

当时，《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说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我记住了这句话，认为工作组是“挑动学生斗学生”。我这是各打一巴掌。因为这句话，我虽然没有给工作组写大字报，也不赞成蒯大富的做法，后来仍然被打成了“蒯派”人物。辩论会乱哄哄地散场了。蒯大富后来认为这个会是他的胜利，在 1967 年 6 月 24 日还开过小型会纪念这个日子。

“6.24 辩论”动摇了工作组的权威。6 月 27 日工作组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却发票参加，反工作组怀疑工作组的人都不准参加，我也没让参加。事后知道这是传达中央精神，反击赶工作组走的“反革命潮流”。全校整顿，凡有怀疑工作组言行的学生，都成了批判对象，被称为“蒯派人物”，相当于“反革命”，被押管起来，丧失了自由。全校好多班都有这种人物，但各班也只个别几个吧，而我班最多，除了在蒯大富那大字报上署名的十位同学，还有我，另一位对蒯有支持言论的同学，共十二人。蒯大富是第一号人物，由上一年级的学生看管。其他的被分押到化 9 年级各个班看管，我被分到化 903 班看管。建国以来，我国的政治运动真是多，运动的对象往往被隔离看管起来。(陈批：成立两个“专案小组”，一个是“蒯大富专案小组”，另一个鲍长康等“十人专案小组”。“蒯大富专案小组”是重点，集中了全系的精力整他的材料；我们对此做法都不理解，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同班的同学。)我第一次尝到被看管的滋味，心中很害怕，感到很恐怖。全校展开了“反蒯斗争”，各系，各班都批判“蒯氏人物”，铺天盖地，成了运动的中心。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全系大会，批判蒯大富，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对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说蒯大富是校党委留下来的定时炸弹，是校党委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其实这些论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就在几天前，蒯大富是写大字报反校党委的。文革中的大批判，总是“上纲上线”，无限上纲，往死里整。一次次的批判会，蒯大富就是不承认错误，不接受对他的批判。而我却没有他这一精神，赶快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写检查。

蒯大富虽被看管起来，某一天，他写了一张毛主席语录贴到宿舍楼“新斋”门口，表示了坚持斗争的意思，以后每天贴一张。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的

关锋、戚本禹去见了蒯大富，给他放了点风，说有重要人物支持他，要他对抗工作组的批判，所以他又强硬了起来。

除了蒯大富之外，我班“蒯派”人物一个个地被全年级学生轮番批斗。有一天轮到开会批判我，突然改变了，宣布改成全校批判蒋南翔的大会。自此，就再不批判学生了，专门批判校党委。某一天，我班全班同学除蒯外（**陈批：我记得鲍长康也没有参加**），被工作组带到甲所开会，那是清华校党委原来办公的地方，我第一次进这么高级的会议室，很大的玻璃镜子，高档的会议桌和椅子。我们围着桌子坐定，进来一位中年妇女，穿着短袖衬衣，坐到靠我边上的椅子上。我当时不知道她是谁，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陈批：事先我们已知道王光美要接见我们。我们整齐地排好队去甲所。王光美站在会议室门口迎接我们，与我们一一握手。大家坐成一圈，王光美刚好坐在我的旁边。她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手中拿的是一支铅笔，在一张白纸上作记录。当时中央已经在开全会，对刘少奇可能已经很不利。**）王光美主持会议，与我们交谈，我感觉到主要内容是给受批判的同学消除点压力，但要我们与蒯大富划清界限。会议约一、二个小时。会议毕，让王光美先出了会议室拐入某个房间，才让大家离开，有点神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光美。

又过了几天，大礼堂前贴出一张大字报，只有简单几句说“北大工作组撤走了”。紧接着，众多的大字报贴出来了，报道北大工作组的情况，报道江青在北大讲话，控诉工作组迫害她女儿。马上，清华的工作组再也控制不了局面，撤走了。批判学生的善后工作由学生来做，我的检查都退回给了我，903 班的同学当着我的面，将审问我的记录扯碎扔掉。

大约是 7 月 29 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部分学生大会，会上刘少奇被迫作检查，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清华就这样经历了派工作组、怀疑工作组，批判学生这一个阶段。北京各大专院校都有相似情况。现在回忆，有两点看法。

1. 派工作组本身不是错误的，建国以后多次运动都有派工作组的形式。例如，就此前不久的“四清”运动，清华的学生约一半都去当过工作组成员。但是，这种

批斗学生的方法是错误的。历次运动，比如反右斗争，都有批斗，文革中就特别激烈了：工作组批斗校党委、批斗学生，后来又被学生批斗，王光美也被清华学生批斗。现在看来，批斗人完全是违反宪法的，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非法伤害他人。但愿中国今后不再发生这种批斗的事，要按法律办事。

2.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几天，毛泽东就离开北京，让刘少奇主持工作。这可能是一个阴谋。就是让你负责，而又让中央文革这些人暗中制造麻烦，煽起怀疑工作组的风，然后适当的时候回到北京，说你执行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作为打倒你的理由。现在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搞文革的主要动机就是要打倒刘少奇。

四、清华大学的红卫兵

工作组撤走了，文革小组掌权，继续批判校党委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可是受过工作组整的学生不答应，要批判工作组，叫嚷要把工作组负责人揪回清华批斗。这样，以对工作组的态度，学生们又重新划成了两派。1966年8月8日，反工作组一派的学生在大礼堂开串联会（我参加了），鼓动组织起来批斗工作组，后来就称为“88派”。8月9日，另一派也在大礼堂开会，后来就称为“89派”。这样，清华大学以对工作组态度第二次划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第一次“造反派”中的高干子女，一般变化成了第二次的“保守派”。

组织“红卫兵”，是从清华附中开始的吧，我不是很清楚。清华大学则由刘涛、贺鹏飞、李黎风、刘菊芬等人为主要领导，“89派”学生为主体，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没有参加这个大会（以后的几次，我也没参加）。在纪录片中看到，毛主席穿上军装，红卫兵代表上了天安门（清华的代表是刘涛等几位）。清华的“88派”成立了另一个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清华就有了两个观点不同的红卫兵组织。我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带上了袖章。但这时的“88派”红卫兵认为，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但也不是英雄。蒯没有参加“88派”红卫兵。

1966年8月22日晚，周恩来总理到清华向全校师生作报告。在西大操场上搭了临时讲台。那天晚上断断续续下着小雨，台下学生一次又一次地呼喊：“给总理打伞！”总理却一直不让打伞，冒雨作报告。总理的报告，讲了工作组这样批斗学生是错误的，但是，也没说怀疑工作组就是正确的。对蒯大富，周总理讲，

蒯大富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也没说他是英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直接听周总理作报告。周总理的报告，很快根据录音整理刻印成册子，我可惜没保存一本。（陈批：为了开这个大会周总理事先做了很多工作，在人大大会堂分别接见了不同观点的人，包括我们这派的朱金根。据朱事后说，周总理事先交代，你们发言不能再说蒯大富是反革命，否则我就要给他平反。当时朱代表我们在大会上发言时脱离事先我们准备好的讲稿，喊到：“蒯大富是不是反革命？”会场一片“反革命！反革命！”。朱发言后安排蒯发言，会场一片“下去！下去！”的喊声，不让蒯发言。后来总理在会上说：今天的大会是很好的“群众斗群众大会”。接着为没有安排好这次大会做了自我批评并为蒯平反。后来，朱金根为自己没有听周总理的指示、给总理增添麻烦感到十分悔恨。朱金根说周总理称蒯大富他们是“激进派”。我倒觉得总理这种提法是顶确切的。）

清华园接下来这段时间，是两派互写大字报攻战。我召集我班的十个人（十二个被工作组批斗的学生中，将蒯大富及另一位同学排除在外，以示和蒯大富有差别）写大字报，控诉工作组对我们的迫害，同时也批判保工作组的观点。即那时我们也要与蒯拉开距离。

不久，北京城内兴起了“破四旧”。结果却是破坏文物，抄家、打人、打死人等一系列搞破坏的违法行为（这里要特别指出，这些是以高干子女为主的红卫兵干的，与清华后来的“井冈山红卫兵”无关，与蒯大富无关）。在清华大学，保工作组这派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刘涛、贺鹏飞这派的）为表示“革命”，拆毁了典雅的清华二校门。那天，我听到高音喇叭喊，要拖拉机开到二校门。据说，那天将“牛鬼蛇神”（即被打倒的校级领导）叫到二校门搬拆毁的砖块，一边搬，一边还得喊“我是牛鬼蛇神”，否则就挨打。

清华的二校门被作为“四旧”拆毁了（注意，不是蒯大富这派干的）。1967年在清华“井冈山”即蒯大富掌权的时候，在二校门废址建了一个毛主席挥手的全身塑像，座台刻上由林彪亲自给题字的“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万万岁”，即“四个伟大”的题词。落成时我们围着瞻仰。这

是文革中第一个毛主席塑像，此后他的塑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北京各高校，在全国各地树立了起来。我毕业后到甘肃工作，路经兰州就见到在东方红广场树了一座巨大的毛主席像。清华的塑像是站立挥手姿势，同学们纷纷留影，照片上写“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班毕业前夕，全班在毛主席像前合影，现在我班每个人手中还有这张照片。文革后期，全国的毛主席塑像纷纷被拆除，清华的也被拆除了，在原址照原样重修了二校门。现在见到的，就是重修的二校门，清华已将之作为注册图案，此是后话。

两派红卫兵混战一阵子，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传到了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即反工作组的这一派就占了上风。

刘少奇在党内的位置由第二位下降到第七位，接着通知下来，收缴刘少奇的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表明刘少奇已经开始被整垮。当时，我心中庆幸自己站对了队。

蒯大富虽然是反工作组的第一干将，但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仍把他排斥在外。9月份，蒯大富着手组建“井冈山兵团”。我开始时犹豫，迟迟没加入他这个兵团，蒯大富问我：“是不是害怕了？”我被他激将，就加入了“井冈山兵团”。之后由我主持成立了“井冈山工化系分部”，任负责人。

1966年10月3日，在北京首都体育场召开10万人的红卫兵大会，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全都到场。这个大会上，让蒯大富担当大会主席，这样，就把蒯大富摆到了一个“革命英雄”的位置，很快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10月3日大会表明了中央文革小组对蒯大富的支持，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就猛烈扩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入了“井冈山兵团”，而“清华大学红卫兵”销声匿迹了。清华大学一时成了蒯大富的天下。

1966年约11月份（本刊注：应为9月6日），若干院校红卫兵联合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江青，康生等人都出席坐在主席台上，蒯大富作为“司令”（本刊注：“三司”主要负责人即所谓“司令”当时是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带领大家念誓词“……生为毛主席而生，死为毛主席而献身...”。我参加了这次大会，坐在主席台下前几排，清楚地看到蒯大富与

康生言谈说笑。因首都红卫兵已经有了两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就称为“第三司令部”，后来就简称“三司”。“三司”声势最大。

自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全国进入了串联高潮，坐车不要车票（在北京，一段时间内吃饭也不要钱），我在12月份也出京串联考察了一个月，去了长沙。长沙也出现造反和保守派，我与造反派有过接触、表示支持，但没做具体事情。在长沙，去了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那时是湖南省委组织的，每天几辆解放牌大卡车免费接送去参观，每人还发一枚毛主席纪念章。

我与两位遇到的北京中学生步行到宁乡“串联”。这里我做了一件当时是“革命”的，现在看来是很荒唐的事。宁乡是刘少奇的故乡，宁乡县城食品公司的橱窗里挂了一幅画——“刘少奇故居”，是一座高楼门大瓦房。我与两位中学生写了张大字报说他们保刘少奇，欲贴到玻璃上。公司的负责人马上出来，没谴责我们，客气地说：“不要贴大字报了，我们马上把这画取下来。”第二天就不见此画了。宁乡县政府客气地给我们安排汽车票让我们回了长沙。

五、“井冈山兵团”及其“批斗王光美”，毛主席接见蒯大富

现在回忆起来，清华“井冈山兵团”成立之始，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操纵和利用，充当了打倒刘少奇的工具。当时这些学生自认为是“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是完成光辉使命。“井冈山兵团”第一个到北京城游行，公开在社会上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我没参加这次活动）。两次“批斗”王光美，从身心上打击国家主席，我参与组织了这两次批斗会。

1、第一次“批斗”会。

1967年元月6日，我班一位同学带了一些人到建国门外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去抄杨献珍的办公室，想找到“材料”批判杨献珍。但没达到目的反而连人带车被扣下了。井冈山兵团总部办公室主任潘某，让我去调解将人要回来。回来之后天已黑了，潘突然告知我，王光美抓来了，立即批斗王光美，让我先集合工化系学生队伍，先围好主席台。

原来那天，王光美在北师大附中念书的女儿要在大会上做“检查”（她支持工作组积极参与了批判学生），清华水利系几个学生想到了一个鬼主意：他们将她控制住，连哄带吓，让她给她妈打电话说出车祸了，在儿童医院做手术。女孩年

幼无主张不得已就打了这个电话。水利系的这些学生控制住了儿童医院所有的电话不让接，在儿童医院等着。王光美在刘少奇的陪同下来了，这些人不顾国家主席及夫人的尊严，将王光美塞进吉普车就拉到了清华。我集合学生围好西大操场主席台后，高音喇叭响了，通知全校师生到西大操场开重要大会。很快操场上挤满了人。这种会总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或重大的人物来临，所以学生总是积极来观看。我在主席台上，看到王光美被带上来了，外面套了一件军大衣。北京元月天很冷，这军大衣是学生们去农村参加“四清”时借用的。这时，一位中年男子匆匆来到了主席台，自称是周总理的秘书，总理派来的。他说：“总理知道这事以后非常着急，打电话到清华没人接。要我来向清华学生交待，一、王光美来了可以批斗；二、不能打她侮辱她；三、批斗之后送回去。”后来听说，总理知道这事之后非常气愤，说“这是法西斯行为”。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总理也不能果断地将王光美接回，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派人来关照王光美不要被打着。

批斗会毫无准备，学生乱哄哄地“批判”，王光美亦随口辩答。我的感觉是，学生说不过王光美。因学生们只是按照报纸上写的或听说的王光美“罪证”来“批判”。这些“罪证”往往不是真实的，王光美的辩护也就显得有理。这次“批斗会”蒯大富不露面以留退路，若上头实在怪罪下来就说是“别人瞎搞的。”

过了几天，清华《井冈山》报整版刊登一篇文章《智擒王光美》。这时候的清华《井冈山》报发行量仅次于《人民日报》。蒯大富拿回这一报纸在宿舍对我说：“戚本禹称赞说：‘这文章真好，可惜《人民日报》不能登。’”这就是我所经历的第一次斗争王光美，也是我第二次见到她。

2、第二次“批斗”王光美。

第二次批斗会是 1967 年 4 月 10 日，是“中央”，是周总理批准的。此会事先做了准备。4 月 9 日夜我的任务是派人守住各校门阻止人拥进清华挤会场。会场设在清华主楼前的广场，主楼的跑车台作为主席台。体育学院的学生先到，负责维持秩序，将会场围成几个区域。我集合工化系全体学生和员工（**陈批：在当时不可能是“全体”，本人就没有去，只是在校园内走走，听广播里传来的批斗声，也到主楼眺望过主席台，人山人海，根本进不去也不想进到会场去。**）坐到最前排围住主席台，阻止人们拥上主席台。那天人山人海。主楼前广场东西约 300

米，往南延伸，超出了校院直到五道口都挤满了人，据说那天有 30 万人参加，是群众组织召开的人数最多的大会。我坐在主席台西侧第一排，王光美就站在我座位的前面接受批斗。主席台东侧的前边，蒋南翔，彭真，杨尚昆，薄一波四人陪斗。批斗会开一段时间，将王光美带入主席台后的主楼内，休息一会儿被换个打扮再站出来。如各种报道上说的，王光美被仿出访印尼时的打扮穿件旗袍，用乒乓球作一串“项链”带上。王光美不作反抗，但也不卑不亢站那里，任由批判者怎么讲（不准她说话）。我班的一位同学代表我班发言。某系有一位同学是在被工作组批判时去卧轨自杀弄断了两条腿，也安排了发言。

这就是第二次批斗王光美，我参与了这件事，是我第三次见到王光美。很快，批斗会的照片传遍全国，现在，在网上还能见到当时的个别照片。这次批斗会，是“中央”将王光美交到群众组织手中受“批斗”、受污辱。说明这时，毛泽东已成心将刘少奇打倒，将几十年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战友当作仇人整治。批斗王光美，是对刘少奇的直接打击。我们这么一批学生抱着“忠于毛主席”的热情，充当了打倒刘少奇的打手。当时是“革命行动”，现在看来完全是错误的。但是，这些错误行为，也不能怪我们，当时的年轻学生是受了利用。

3、毛主席接见蒯大富

1967 年 5 月 1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接见了蒯大富。那是一次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大会，蒯大富被邀请上了天安门城楼，周总理将蒯大富介绍给毛主席。在毛主席伸手，蒯大富伸手，两手将接触时，记者拍下了一张照片。过几天在宿舍，蒯大富高兴地将照片拿给我看。受到毛主席的接见，那时是最光荣的事。这次接见说明了毛主席对蒯大富的支持。

六、“清华井冈山”的分裂

“清华井冈山”自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合并伊始，就有思想差别，就有权力之争。有一批更激进的人，组成一个战斗队叫做“廿八团”，据说林彪在井冈山是“廿八团”团长，以此起名表示像林彪那样忠于毛主席。“廿八团”是蒯大富的嫡系部队。而另一派人，似乎主张比较温和、更策略的“革命”。这另一派人终于在 1967 年 4 月 14 日召开串联会，宣布脱离蒯大富独立。自此清华井冈山分裂成两派：“团派”和“414 派”。我是当然的“团派”成员。

这样，清华大学就第三次形成了两派，两派都是造反派，而团派更激进。

井冈山分裂成两派之后，工化系团派的人认为我太软弱，在一次会议上起哄推举我班另一位同学当分会头头，我也有些厌倦不想干了，趁此甩掉了这一职务。几十年后同学再会时，我班这位同学说：“大定，你还记得不，是我把你赶下台。”大家一笑了之。我虽然再没当这头头，仍然是团派的人，参加了一些活动。主要的一次是“揪刘火线”。

清华“井冈山兵团”一直把矛头对准刘少奇，充当反刘先锋。大概是 1967 年 7 月份，集合浩荡的队伍到中南海门口示威游行，高喊口号“打倒刘少奇”、“将刘少奇揪到清华批斗”。这一行动，据说是蒯大富受到了张春桥的指使。当时我是作为工化系的领队人员之一参加的，在中南海西门喊了一阵口号就回校了。之后各院校响应声援，惟恐在“揪刘”行动上落伍，到中南海门口闹哄了好多日子，把这称为“揪刘火线”。

清华的两派争斗，完全成了春秋无义战，后来我基本上不参加派别活动了。我得到 8 月 1 日的不要钱的火车票回家玩。8 月 2 日到武汉就知道了：8 月 1 日武汉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一周年，进行横渡长江活动。因为观看的人太多，后面人将前面人挤到水中，淹死了几十个人。那时不少地方年年搞这种横渡纪念。我到了家乡湖北郧县。郧县当时出现了多个造反派，矛盾重重。我动员各派协调合作，没起到什么作用就不再介入了，9 月份返回了学校。

七、我在清华分校

大概 1968 年春节过后，清华分校（建在四川绵阳青义镇的小山坳里）来了几位造反派工人，要求井冈山派人到分校“领导革命”。团派总部派我去，我也想到四川看一看，就欣然答应了。文革前，清华、北大开始建分校，北大的分校选在汉中。我第一次进川。火车上非常拥挤。在弯道处看到前后车厢，车厢外，车厢顶上都坐了不少四川老乡，他们冒险这样坐车外出或回家。到了清华分校，那时还只是一个未建好就停工的工地，对外称为“651 工地”（意思是 65 年 1 号工地，北大的称为 653 工地）。工地上约六十几位职工，基本上是四川的年轻人，两位清华 64 年的毕业生分配在这里工作，当时就是管理职工，看好工地。由于二位老师被打成“保守派”，管不住这些职工，工地成了无政府状态。我去之后，以井

冈山的名义，与职工中的造反派头头，成立一个“井冈山兵团 651 分团”。他们很听我的。我规定不准参与社会上的文革活动，要“抓革命、促生产”。管理工地具体该做哪些事，我听二位老师的意见。我责令回家不上班的职工回工地上班，否则停发工资。这样，就把职工组织了起来，作些能够做的事。后来我回到北京清华时见到了这二位老师，他们称赞我在那儿做得很好。这个工地在文革后变成了西南建材学院。

我在清华分校作了一件错误的事。那时，清华发生了武斗，“团派”派来一位同学（他原先在这里参与了绵阳的文化大革命，熟悉不少造反派）搞武器，要我出车配合。我派车同去了一次，但这次没搞到。在后来的“清查 516”过程中我交待清了这事，大概是核查属实，也就没有事了。

八、武斗，工宣队进校与“红卫兵运动”的结束，毕业

清华的团派和 414 派在 1968 年终于爆发了两派武斗。全国此前已经有了广泛的武斗。例如我去的绵阳，两派武斗死了不少人，一派的人被赶出绵阳城到山上“打游击”；陕南的安康及平利县武斗，我大姐家被烧。全国武斗，尤其是北京高校武斗，说明了文化大革命已经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是毛泽东原先没想到的吧？这种情况下，向北京各高校派出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工宣队”。工宣队进清华时，受到了当时武斗占上风的“团派”，即蒯大富这一派的抵制，据说打死打伤工宣队人员多名（从武斗到工宣队进校，因我不在学校，具体情况不了解）。这时，毛主席又一次接见蒯大富等“五大学生领袖”。但这一次不是表扬而是批评、警告（当然，毛主席不会说自己有责任）。武斗最终消除了。学生归到各班在工宣队领导下活动。这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也就完全结束了，学生们参加的文化大革命也结束了。

约 1968 年 8、9 月份，当时我在家接到同学来信，告知工宣队进了校，将要毕业分配，我就回校了。回校后看到“井冈山”的主要头头几十个由工宣队统一办“学习班”，我班有二、三名同学在其内。各系，各班都由工宣队管理。我班同学重新欢聚一堂。文革以来我班是全校、或是在全国对立最突出的班，同学之间形成严峻的两派。（陈批：我倒觉得我们班虽然经历过文革的风风雨雨，但并没有给我们感情造成太多的伤害。因此至今我们班同学之间关系还是融洽的。关键是：

无论哪一派得势时，都没有给对方过激的人身伤害。所以“全国最突出”一说，本人不敢苟同。大定兄不知是否同意？）两年多过去了，两派同学们似乎明白了，都是受害者，所以全班同学友好热情。这时，大家一致推举我当了班长。

这时候的政治气氛是全国人民歌颂毛主席，宗教式的狂热。工宣队带头跳“忠字舞”，我班也全体学会了。工宣队带学生并不上课，只是每天学“毛选”，熟背“老三篇”。新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更精致，林彪写的前言：“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这么长的一段话谱成了曲，大家一齐合唱。

工宣队进校后领导全校，工人中普遍称“师傅”，所以对工宣队中每一个人都称“师傅”。这一称呼一直流传到社会，时兴了好多年。

临毕业前的一件大事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召开。那天通知说有重要新闻组织全体学生听广播。广播的是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公报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听了广播之后每个人都沉默不语。在这前一年，我还积极参与了“打倒刘少奇”的运动，但是，运动发展到这种状态时，心中对文化大革命也产生了怀疑。现在看来，这次全会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大会，对刘少奇作了完全错误的处置。用党的大会来撤销国家主席，也是破坏宪法、以党代政的极端做法。

1968年12月份，在我们将毕业分配时，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这样，城市里几乎所有的中学生都到农村“插队落户”。这实际上是为了疏散城市里那么多停课闹革命的学生，以收拾局面。文革十年，大、中、小学都“停课闹革命”，造就了一代新的文盲和半文盲，形成了科技人员的十年断代。这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之一。

我们当时还是由国家统一分配，贯彻的是绝对服从分配，党叫到哪就到哪。我班的分配情况是：包括我，七人分配到核工业部的企业，我分配到核工业部甘肃七九二矿，但是先到沈阳兴隆店部队农场劳动。蒯大富分配到宁夏青铜峡一座冶炼厂。还有部分同学是分到甘肃、河南各省再二次分配。

要分别了！同窗六年风风雨雨，留下了无尽的感情，全班同学在二校门毛主席塑像前合影留念。我因为是元月10号到农场报道，这十多天的日子又回不了家，所以就在学校送走了每一个同学，才踏上去东北的列车。

附毕业合影，后排左一是我王大定，中排左二是蒯大富，中排左三是鲍长康，后排左六是陈祯祥：



九、化 902 班同学毕业后的概况

我班同学到工作岗位后，基本上都担任重要技术工作。现在大多数都退休了。这里特别记下蒯大富。他毕业后分配到宁夏青铜峡 304 厂。不久，开始清查“516”，被抓到北京清查。后安排在东方红炼油厂劳动。毛主席去世后，逮捕了“四人帮”，蒯大富、聂元梓、王大宾、谭厚兰、韩爱晶也被捕。在审判“四人帮”的电视记录片中我看到了蒯大富。蒯大富被判 17 年徒刑。他并不承认自己有罪。我同意他的观点。一次，我到清华参加一个学术会，见了大学班主任曾宪舜老师，提到了蒯大富。我说：“蒯大富有什么罪？”曾老师说：“总得有个代表人物吧。”据说，胡耀邦主张不追究学生。但是，邓小平、王光美要追究。1993 年校庆，是我毕业后第一次见到蒯大富。那时他已出狱几年，妻子是北大毕业生，已有了一个三岁的女儿。那时，北京的一家公司聘他当总工程师，但是，北京市委不允许他在北京，据说是王光美发话。他去了常州工作，常州市委又赶他走。宪法

规定了居住自由，就算蒯大富犯了罪，但是已服刑 17 年，恢复了公民权，不该再受限制。后来他只好去了深圳，改名“戴明”，与人合伙做生意。日久真名也就公开了，他自己办了公司搞音响工程。在深圳，他的生意还不错，业务接到北京等全国各地，已有一定财富。这也是他能力的体现吧。（2010-8-7 补充：去年我来到深圳一家公司打工，又和蒯大富见了面。他已经不做公司了，几经周折得到了每月三千元养老金过日子，女儿蒯小琼在北京传媒大学读书。）

2004 年 12 月于江苏江阴初稿

2005 年 12 月于河南许昌续改

2010 年 8 月于深圳修改

附——

陈祯祥转贴王大定文章的前言：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一场什么革命？我想起 1966 年工作组撤走以后，蒯大富刚刚出名时，我们开始“逍遥”，当时全国各地有许多人给蒯大富寄信。其中有一封发自西安、署名“恕不留名”的信件，顶厚的，我们知道这不是蒯的家信，就拆开看。信中说：我们国家将来就靠你们来接班，应该让你知道我们的国情。他详细地列举了从 1936 年起到文革前，中国人均粮食产量是逐步降低的。信中说，今天的文革实际上是“洋枪派”与“锄头派”的斗争。他说，我们中国现在好比一家不太富裕的农户，面对外部威胁，去买一只洋枪好呢？还是去买一把锄头好？每年召开经济计划会议，各个部门都会引用马、恩、列的语录为自己争钱，十分激烈。现在是“洋枪派”得势，但中国的吃饭问题得解决。写信者明显是“锄头派”，即目前邓小平一派。此信我只是看了一下，有人曾在本子上作过记录，不知是否还留有？

我是 1966 年 3 月入党的，在批判蒋南翔时，是我班“十七人小组”一员。当时我们认为：先批判而后再下结论。工作组进校了，我们不知什么时候成了“保皇派”，就靠边站了。蒯大富则是我班的“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当蒯大富提出向工作组“再夺权”、将矛头直指工作组时，我们又成为工作组的依靠对象，成为“反蒯”的先锋。工作组撤走后，我们就成为“保蒋、保工作组”的双料“保皇派”。从此以后，在清华的文革舞台上再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成为无所事事的“逍遥派”。清华开始“复课闹革命”，我才又有机会坐在清华的教室里重新学习。一天上午，在主楼的一间教室里我们要上课了，可是上课的同学比往常少了许多。老师在台上说：今后不管是“团派”还是“414 派”，只要是一派组织的会，我们的课照常上；两派联合召开的会，我们就不上。一会儿，进来了几位同学，说：“团派”和“414 派”在新航空馆打起来了！等了好一会儿，同学也没有再来的，老师看实在没法上课，就说：今天的课我们就不上了。这就是我在清华的最后一堂课——如果这也算是一堂课的话。

清华武斗开始了！我们几位同学将被褥及书籍都搬出新斋宿舍，存放在北航一位我班同学的老乡那儿，坐上南下的慢车，十分钟一停站地走上逃亡之路。

工宣队进校后，结束了清华的武斗。我们接到通知，返校等待毕业分配。大家又重新坐在一起了，鼎鼎大名的“蒯司令”、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清华大学革委会筹备组主要负责人居然久违多时和我们也坐在一起，只是此时我不时听到的是老蒯的感叹声——泄气声，“咳！咳！”声不绝于耳。

毕业分配我被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工委，当时绝大多数同学都被分到偏僻的基层，我算是幸运的。全校 9 字班只有 64 位被分配到国防科工委各个研

究院，包括一些高干子弟，如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王恩茂的女儿王北离，孔石泉的女儿孔原，及王新民、王楠等。

前几天，我班的王大定同学给我发来邮件，他将他写的《我在清华大学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一文作为附件一并传给我看。我看后觉得很有可读之处。他写了许多自己的经历及感受，对于今后研究清华大学文革历史有参考价值，我建议他在“校友网”9 字班社区上发表。我觉得 9 字班社区现在思想相当活跃，发表了许多具有独立见解的文章。他欣然同意。因为他未申请成员资格，叫我帮他转贴。文中我觉得有些出入之处，本人就以“陈批：”的形式作一些注解，不一定注解得都正确，只是多一些意见供大家参考而已。

2009 年 6 月 7 日

【蓦然回首】

按：叶志江，文革时为清华大学数学力学系学生，属“团派”观点。在“清华百日大武斗”中因其女友、井冈山兵团勤务组成员陈育延被 414 派抓进科学馆关押，冒险前去探视（打算进行营救）时遭到关押，直到工宣队进校后才逃离。写有记叙这段经历的《救美——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载华夏文摘增刊 666 期·文革博物馆通讯 498 期，2008 年 8 月 19 日出版）。

关于在清华武斗中当“俘虏”的一些经历

——给《倒下的英才》作者唐金鹤的信

叶志江

金鹤学长：

谢谢你的来信。因为忙，也因为在思考如何回信，很抱歉拖延了一些日子。我下周二要去美国，想起还没有给你复信，赶紧坐下来敲键盘。

你的《倒下的英才》一书涉及到我的两篇文章中若干情节的真伪，作为文章的作者或澄清或辩驳是责任所在，所以我回应了两篇短文《倒下的英才和救美风牛马不相及》和《蹩脚的工程师和眼花的老祖母》，想必你已看过。我想，这和我个性或“一贯的所作所为”应当无关，而是属于人之常情，也是一般读者，特别是清华校友希望看到的。

我很高兴你能考虑再版时加入我的“一面之词”，让读者可以加以分析比较。但你建议我“重新写一段你在科学馆内被打的情况”，我想并无此必要。

我最初写《救美》和《徘徊在生死之间》，并非是想揭对方的“疮疤”，更不是如蒋南峰暗示的那样，是“总想在 414 里找点什么来加以妖魔化”。我只是想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在那样一个年代，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人和发生过这样一些事。我相信年轻人并不会因为读了我的文章后去关注清华两派的是非恩怨，而是会从中读出那个年代的非理性和人性的扭曲，也能感受到人类的良知永远不会泯灭。

如果硬要统计哪一派犯的错误或罪行更多更大，我想我会同意，就一个派别而言，团派所犯的错误或罪行更多更大些。但就个人而言，在任何一派中都可以找到许多例子去证明人类的良知永远不会泯灭。

作为文革的产物，文革中的一个造反派派别，414 派也绝非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全身而退”，这不仅是指在政治路线上所犯的错误，而且在人性的扭曲上也同样打着时代的烙印。沈如槐说两派“同归于尽”，这既是历史已经走过的路程，也是团派和 414 派同是文革产物的合理结局。

文革历史确有它被扭曲的一面，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后责任”的大旗下，有人在复原真实的文革和寻求社会变革的轨迹，有人在思索人性的真善美和丑陋，但恐怕也有人不甘于“同归于尽”的结局，力图确立某一派别的历史地位。我想，这或许是引起争论的主要原因。

以下这段文字是在收到你的信之前写的，我已贴在网，这不是“重写”科学馆的故事，而是以文革中的人性为主题的追忆。

我一向认为，文革时期有人性扭曲的丑恶，也有人类良知的美丽，处于腥风血雨中的科学馆也同样如此。我赞美过科学馆里“伟大的女性”，因为她们，我得以免受更大的苦难。几十年中，每当见到当年留守科学馆的女同学，我都会油然而生敬意。当然，也有个别女生“不爱红装爱武装”，对我“动手动脚”的，但在“七次毒打”中只有一次，我凭喝骂的声音听出敲打我头部的棍子中，有一根棍子是握在女生的手里，有点金玉奴棒打“多情郎”的意思。

男生们“武攻武卫”，出生入死，火气大是难免的。有了火气，便要发泄，俘虏们（其实也不能算是俘虏，都未上过战场，称“人质”恐怕更正确些。人质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所以科学馆里的事也不能称为“虐待俘虏”）白吃白住，义务充当出气的靶子也是应当的。人性的扭曲往往是环境使然。

离开牢房时，俘虏们都必须蒙上眼睛，所以我们只能见到看守的脸，其他人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七十天的囚禁中，见过三任“看守”，两任为男生，一任女生。奇怪的是，两任男看守都比那女看守温和。女看守管男囚犯算是开创先例，无经验可循，从严管理也是应当的。俘虏们背后给女看守起了个外号，叫“如临大敌”，可见其威严之状。

担任看守时间最长的是“小宝”（小包？），我们朝夕相处，至今很怀念他。不知他如今身处何方。在我们被关押期间，他很有趣，也很人道。

我将蒙住眼睛的布叠成两侧很厚但中间留了一条很窄的薄层，可以模模糊糊地看见人影。有一次他起了疑心，拿下来套在自己的眼睛上，说：这不是看得清清楚楚吗？但他居然让我继续使用这“蒙人”的眼套。陈家宝将一个“线帽子”套在头上，就看得更清楚了，他也不加干涉。这为后来陈家宝逃跑时，能看清门口无守卫人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我母亲探望我时，他笑容可掬，一再宽慰我母亲，替我掩饰被打的情况，让我母亲放心而去。母亲走后，他又恩准全体俘虏分享我母亲带来的可口饭菜。这样的饭菜，科学馆里的老四是绝对吃不到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即使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忍不住偷偷地吃一口。

当他得知我“便秘”近一个月、痛苦万状后，他又按照陶森老师指点的办法，亲自将肥皂削成“子弹头”，并给我足够的时间去“挖隧道”。没有这颗“穿甲弹”，我势必演化成科学馆里只进不出的“黑洞”，不管是馊饭还是什么饭都只能“拒吃”了。

我的第一任看守只做了几天，他在我的记忆里已很模糊了，但我永远记得我头上被打出几十个“鼓包”后的那个晚上他对我的照料。我双手反绑，头部无法碰触坚硬的床板，只能坐着。他问我为什么不躺下，我告诉他头上的“鼓包”碰到木板很疼。他摇了摇头说：“他们打你头了？”随即解除了捆绑我的绳子，并返身出去找来了一条棉絮垫在我的头部。

我记得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曾将我的回忆文章命名为“互联网上的回忆”，因为这些回忆是通过和朋友、校友在互联网上交流后产生的，电子邮件、社区留言都是这种交流的形式。没有互联网，或许就不会有我的回忆。因此，你可以看到在我的文字中出现一些别人和我通信的内容。但我都是事先说明了的，如果对方并不想和我一起在互联网上回忆往事，我是不会做让人“不喜欢的”事的。这也是我想让你知道的。

叶志江

2009年12月26日

【争鸣】

[流着眼泪剥洋葱](#)

——《倒下的英才》再版后记

陆小宝

回忆就像洋葱

每剥掉一层

都会露出一些

早已忘却的事情

层层剥落间

泪湿衣襟

——钧特·葛拉斯

唐金鹤所著《倒下的英才》一书，去年十一月在香港出版，现在正在准备再版。这么快就再版，是因为此书大受广大读者，特别是文革研究者的欢迎。还有一个原因，这此书出版后，唐金鹤对清华百日武斗的历史又进行了一些调查和了解，她准备用这些新的资料对此书进行一些补充和修订。比如在再版中加进了七二七事件中工人宣传队的死亡者名单，等等。无疑，这些补充和订正是很有意义，也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此书的再版，还有更加重要的理由。

此话怎讲？

原来，《倒下的英才》出版以后，在社会上、在清华文革的亲历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在清华校友网上，引发出一系列的精彩文章。说其精彩，是因为这些文章几乎是清华文革的原班人马、保持当时派别的阵容，对唐金鹤的书展开的一场尖锐的辩论。参加辩论的不少还是当年清华文革中的成名人物。如果有一位文革研究专家，追踪此书从初版到再版的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事态，把所有相关辩论文章搜集成册发行，这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它可以让人们看到，这些参加清华百日武斗的知识分子精英，过了四十年后，他们的思想有了哪些进

展。对唐金鹤在书中揭露出来的血腥暴行，他们敢于直面承认吗？他们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这个工作可以促进我们对文革的反思逐步深入：从复原事实深入到分析原因，从回忆历史深入到联系现实。

我想起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剥洋葱》。

《剥洋葱》是 1999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钩特·葛拉斯写的一本回忆录。葛拉斯是德国人，这此书记叙了他从 12 岁到 32 岁的生活经历。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叙述，是作者在 17 岁时，曾经参加过党卫军，未发一枪，受伤被俘。他在回忆中说，“我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为“共同负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

在得到诺贝尔奖的崇高声誉后，葛拉斯冒着千夫所指的危险，自曝其秘。其道德勇气令我肃然起敬。

当时年仅 17 岁，又没有放过一枪的党卫军，为了一种他称之为“共同负责的东西”，一直承受着“耻”和“愧”两个字的良心自责。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里，大概是病态的自寻烦恼吧。问题是，对德国精英的这种“病态”的道德良知和道德勇气，我们中国的精英，我的清华大学同学们，是否也该有所感悟呢？

我无意拿文革来同德国的二战相比拟，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历史事件。令我深有感触的，主要是葛拉斯的这个妙喻：回忆就像一颗要剥的洋葱。洋葱皮层层叠叠，紧紧包裹。剥的过程，总是让人流泪。但是只有剥开它，洋葱才会露出粉嫩的核心。

是啊，反思文革也需要多重剥离。

现在，我决心去剥“清华文革这颗洋葱”。

反思文革需要多重剥离

文化革命是全国亿万人参加、长达十年的大运动。这里面，上头下头，明里暗里，各种思想流派，各种利益阶层，交混在一起，异常的复杂。长期以来，国内对文革的评论是非常政治化、非常牵强、也是非常不实事求是的。这就是上头常说的，“彻底否定文革”，“宜粗不宜细”。人们习惯于把一切责任，推给“四人帮”；把一切污水，泼向造反派。许多文革回忆文章，往往是张冠李戴，将别人

干的坏事，统统加到“四人帮”和造反派的头上。如果我们继续套用这种“宜粗不宜细”的办法，那就永远也别想得到真相，永远也别想吸取真正的历史教训。那么，要有什么办法呢？正确的方法，就是“剥洋葱”的方法，对事实要一层层地分析、一层层地剥离。

洋葱怎么剥？

两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曾尝试过这种层层剥离的方法。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出一系列的观点，即：三种文革形态，两支文革主力，两个极端派别。这些提法在部分同学中引起关注。我认为：

一）在清华，文革运动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或三种形态。开始，是刘少奇工作组的文革形态，主要内容是抛出蒋南翔、把80%的党政干部打成黑帮、把大批学生打成反革命。它的中心代表人物是王光美。接下去，是群众运动的文革形态，主要内容是批判刘少奇，夺权，群众组织分裂和武斗。它的中心代表人物是蒯大富。最后，是工宣队的文革形态，主要内容是清理阶级队伍和所谓教改。它的中心代表人物是迟群。这三种文革形态，都不高明，都发生了逼人致死的恶性事件。人们习惯于将清华文革中的种种坏事，归咎于蒯大富时期的群众运动。其实，文革中两派分裂和争斗的因由总根是王光美时期种下的。特别应注意的是，迟群的工宣队阶段，可以说这是排除了前两阶段的干扰后，毛泽东心目中最期许的文革式样，而这个阶段中自杀的人数，却是清华文革中最多的。

二）文革群众运动中，先后曾有两种运动主力登台表演。一种是干部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另一种是以平民子弟为核心的造反派。前者的先锋力量，可溯源于三论“造反有理”并首倡成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他们“破四旧”、“斗黑帮”，以“血统论”为名大肆制造红色恐怖。它在清华的代表是刘涛、贺鹏飞等人领导的“八九派”。最早从干部子弟控制的文革运动中挣脱出来，树起平民造反派旗帜的，是唐伟领导的“八八派”。其后，受刘少奇资反路线迫害最深的“蒯派”成了平民造反派的的核心，其群众组织是“井冈山”。这两种文革主力，干部子弟的红卫兵和平民子弟的造反派，都宣称自己是“造反”，但两者“造反”的动因，却有很大的不同。干部子弟红卫兵要“造反”，是因为他们觉得他的特权不够，要扩大这种特权；平民子弟造反派的“造反”目标，却是要反对特权。这两种文革主力，在他们行世的时期，都制造过血腥暴力事件。如，前者有八二四事件，

后者有百日武斗。但两种文革主力的肇事者，在文革后的政治命运，却有着天壤之别。干部子弟红卫兵，基本上安全过关，不少人还因之春风得意，官居高位；平民子弟造反派，在文革中和文革后受到一次次的清算和整肃，有的人甚至锒铛入狱。在文革回忆中，许多人习惯于将干部子弟红卫兵所做的坏事，有意无意地指认是平民造反派所为。干部子弟红卫兵却大多安心于这种“黑狗咬人，白狗挨罚”的错误处置，到目前为止，极少看到有干部子弟红卫兵站出来，主动承认自己对何种恶性事件负有责任。

三）在平民造反派内部，逐渐分裂成多种派别，最终形成观点最走极端的两派对立。在运动中，温和与理性，没有存活的条件。比如，一度自以为居中的天安门纵队，很快解体，其成员分别只能参加极端的两派：团派和 414。这两大派，各执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的一个极端，都属极左，其核心思想都具某种暴力倾向，导致双方血腥武斗，最后同归于尽。由于某些值得探讨的原因，在清华文革中，团派一方所犯的暴行，同对立面 414 相比，确实是要多出很多、并且更为严重。在文革中和文革后，团方人员受到官方的整肃，也比 414 方更为悲惨。如果有人据此评断这两派，何方对，何方错，或者何方胜，何方败，都是有失公允的。

以上是我的一贯看法。洋葱剥到了这个层次，里面还有更深层次，即团、四两派内部的层次，当然还可以再继续剥下去。例如，作为一个平民造反派，他们大多数人思想中的某些诉求无疑是正当的，而他们中某些少数人的行为却是残暴的、严重丧失人性的。这两者之间，应该再作剥离。唐金鹤《倒下的英才》的出版，这是一个机会。我早就一再指出，唐金鹤在此书初版中的某些说法，不是全无偏颇的。但我还是十分支持她，因为她毕竟说出了人们多年来一直不想说的许多事实。我希望，团方人士中有人能够站出来，理性地进行反省和反思。

我之所以看中唐金鹤的书，并写文章支持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唐金鹤的书基本上不涉及两派的政治观点，她只是尽量真实地揭露了，在清华百日武斗中发生过的种种血腥暴行，并从人性为本的价值观出发，而不是从政治观点为本的价值观出发，来谴责这些血腥暴行。现在回过头去看，事实上，无论是团方也好，414 方也好，他们的政治观点均属极左，多不可取；但双方的政治主张又都并非一无可取，许多乃是在极左的外衣下包含着对当时社会求变求新的躁动和向往，但他们都有过丧失人性的血腥暴行，则都是绝对错误的。双方

同学对自己的派别理应进行两重剥离：首先，将政治观点同血腥暴行剥离；其次，将政治观点中的极左成分同合理诉求剥离。

从发表在网上的文章看，部分同学尚无意进行这种剥离的工作。他们也许还沉溺在长期被压制的怨气之中，对唐金鹤的书，他们本能的反应是自我防卫。他们没有兴趣去过问：迫害罗征启是不是事实？折磨谢引麟是不是事实？毒打孙华栋致死是不是事实？活人口中拔牙是不是事实？开枪打死钱平华是不是事实？主动挑起五三〇大战是不是事实？放火烧楼是不是事实？开枪打死这么多工宣队工人是不是事实？……他们不关心这些，他们只是异口同声地指责这是派性。对书中揭露的种种丧失人性的血腥暴行，我相信他们并非真的全然不知，也并非真的都会持赞同态度，但作为一个原先的“派”的成员，他们要维护这个“派”的最后名声。

他们大多指责唐金鹤的书有派性，叙述不全面、情节有偏差，或者对方也有暴力倾向，也有虐待行为，对方政治观点“必胜”的荒谬，等等，似乎这么一来，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就一下变得不存在或毫无意义。有一位同学甚至写道：“忘掉这该死的 530”！但是，“该死的 530”，在清华文革史上是永远忘不掉的。如果拒绝剥离，那么，参加这个派别的所有同学就只能永远同这些血腥暴行联结在一起。如果拒绝剥离，甚至，整个平民造反派的历史都只能永远被这些血腥暴行的制造者所绑架。

反思文革有三个主要层次

反思文革，我还认为，可以分成三个主要层次。对这三个层次，我们还是可以用剥洋葱的方法，一层一层的剥离和分析。

三个什么层次呢？

我先介绍梁启超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五十年中国进化的概况》，是梁先生在 1922 年写的。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指出近代中国在思想观念上有三个转化期，其实呢，也可以说这是梁启超本人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过程中逐渐加深认识的三个主要层次：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遂有洋务运动之发生；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这便引发了康梁的戊戌变法和后来的辛亥革命；第三期，是从文

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只所以感觉如此，是原以为学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后来发现大非如此。”

受梁启超这篇文章的启迪，我们也可以从事实、体制和文化，这三个主要层次来反思文革。

第一层次，反思文革中发生的具体事件，为后人提供历史真相。在这个层次上，众多的文革的亲历者和文革的研究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揭发出来的事实，十分触目惊心，骇人听闻。我们这些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先前所作的回忆、出版的几此书藉，基本上都属于这个层次上的工作。这是文革研究的基础。

第二层次，从我国的政治体制上反思文革，从社会制度上探究文革产生的原因。这个层次上的工作，也已经有不少人在做。他们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共产党内的长期政治斗争的历史、毛泽东思想的深层内涵，以及当时国内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纠葛中，去探索文革的起因和今后中国的走向。这些研究工作很有意义，但由于研究者各自所处的地位、认识水平和实际利益等等方面很不相同，导致他们研究的立场和结论也很不一样。有人主张用彻底否定文革，来促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有部分人，针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提出重新肯定文革，肯定社会主义方向。清华文革亲历者当中，也有不少人在进行这个层次上的思考。

第三层次，在更深入的文化层次上反思文革，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国民性、信仰、理想，及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责任、道德准则和价值观，等等方面，来探索文革的起因、文革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影响，以及今后的国民教育问题。在这个层次上，已经有人开始思考，但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而我认为，这是反思文革的工作中最值得重视的部分。

从政治体制的层次来反思文革，十分必要。在中国实现民主政体，也完全应该。我还是认为，文化层次上反思文革，对现在的中国，这是一个更加可行、更加紧要的任务。我之所以这么说，基于三点理由：

首先，在体制上研究文革虽然前景诱人，但目前陷入僵局。我从网上看到，从体制层次上反思文革的知识精英，已经截然形成对立的两大派，除了各自发表观点和对骂之外，简直水火不容，无法互相沟通。

其次，政治体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1922 年，梁启超积五十年中国现代化

进程的教训后，沉痛认识到“原以为学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后来发现大非如此。”梁启超提出“新民学”、鲁迅提出“立人”的思想，真正关心的人很少，人们热衷于体制上的革命。至今，又有八、九十年过去了，政治体制变了几变，中国的现代化依然问题丛生。

再次，从文化层次上反思文革，有助于深入透视和解决文革后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文革责任推给“四人帮”，对自身的公民责任和道德准则等，缺乏反省。这些问题遗留下来，在新的环境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造成对社会的侵害，有些甚至比文革时更为严重。

唐金鹤《倒下的英才》初版到再版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态，可以看出从三个主要层次来反思文革的必要性。

今年四月初，清华文革的重量级人物唐伟与张鸿庆联名发表《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的文章，评论唐金鹤一书。他们的文章在清华同学中又引起一轮新的评论热潮。尤其是唐伟、张鸿庆文中指出，蒯大富是清华武斗的罪魁祸首。这个提法，不但团方，就是在414方内部，也有很大的争议。孙怒涛同学就认为提法不妥，汲鹏也不同意唐伟的提法。他们认为清华武斗的主要责任，不能由蒯大富来负，当然要由毛泽东、“四人帮”来负。汲鹏在电话中问我，同不同意他的观点。我对他说，我是既同意，也不同意。

我认为，清华武斗也可以从三个主要层次上分析，在这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其主要责任者也各不相同。在第一层次，主要责任者是蒯大富；在第二层次，主要责任者是毛泽东；在第三层次，即文化的层次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都需要反省。

我这里说，在第一层次上，蒯大富是清华武斗的主要责任者。对这个提法，有些同学肯定还是不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蒯大富本人应该更有发言权。不久前，在唐伟、张鸿庆的文章尚未出来时，有一位记者采访蒯大富，写了一篇名为《蒯大富：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的报道。在采访中谈到清华武斗时，蒯大富说，“当时我是我们学校的一把手，影响力是很大的。我们清华最后大规模打起来是1968年4月23日，如果当时我主张不打，那场武斗（百日武斗）肯定打不起来。当时认识上发生了偏差。”在这段话里，蒯大富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当时打不打的主导权在团派一方；第二，他决定武斗，并不是

中央有什么人给了他的什么指示，而是他自己“认识上发生了偏差”。我认为，蒯大富的态度是真诚的，他的话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一直有个感觉，在全国武斗中，清华武斗比较独特，它不像四川和广西武斗那样，有军方和官方的直接介入。所以，对清华武斗中的血腥暴行，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在文化层次上进行剖析。

从清华校友网上的众多文章看，部分同学对文革中的血腥暴力感觉麻木，对自己一派所做的行为不愿承担责任，对人性道德准则的缺失不愿反省。有位同学写道，“冤有头，债有主，文革不是清华发动的。往事如烟，烟会熏人，还是暂时封起来好，自有莲台鉴心明。大家放下心怀，轻松愉快过好余年，余情尚在山水吧。”作为文革参加者，似乎完全不认为自己还有公民责任这么一回事。

我不认为，文革中清华大学是最血腥的地方。我更不认为，文革后清华学生是对公民责任和道德准则最没有认识的人群。其实，这个问题绝不只是清华文革中几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中长期存在的深沉隐疾。文革前即已存在，文革中发病最烈，文革后没有认真清理，一直遗留到今天。这是我们以往反思文革中的盲点。

而这个盲点，却是一个致命点。不管政治体制如何变更，也不管经济如何发展，公民责任和基本人性的道德准则，都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必备的基本要素。缺乏这种基本要素的社会，是一个没有根基的社会，是一个东歪西倒的社会，是一个随时可能出现动乱危机和血腥暴行的社会。文化革命过去了，原式原样的文化革命历史一定不会重演。但是，如果这种社会观念不改进，文化革命的悲剧将在人们不曾预想的时间，以人们不曾预想的形式，一定会一再重演。甚至是，已经在重演，大家还不以为是重演。“范跑跑”，毒奶粉，枪击小学生，等等，就是例证。

唐伟和张鸿庆的文章还提出，应该从教育上反省文革暴力。我很赞同他们的看法。师大女附中的年轻少女，为什么会动手打死自己的校长？清华大学的学生，为什么会制造出骇人的血腥暴行？这些，确实应该从我们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上深刻反省。我们的教育问题严重，这是肯定的。如果问，我们在教育上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以我之见，是过分强化意识形态，而对普通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严重缺失。

反思文革，势必应深入到文化层次上去反思。而在文化层次上反思文革，最重要的目的有两条：其一，是唤醒我们这个民族的公民责任意识；再一，是重建我们这个民族的信仰、道德和价值观念。

唤醒我们这个民族的公民责任意识

什么是公民责任意识呢？我觉得起码是两条：其一，每个公民都要在整体社会中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其二，每个公民都要对自己的行为在整体社会中产生的后果负责。它的前提是，社会以公民个体为本，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相应权利。公民责任的观念，与公民的独立人格紧密相关。离开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思想，就谈不上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网上有位同学说，“清华武斗的发生是那个政治第一、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的产物，是夸大政治分歧鼓吹斗争哲学的结果。而这些恰恰都是中共当局一贯宣传教育的结果。”对此，我很同意。但我还是认为，这个问题还有从我们自己身上检讨的必要。

文革中，青年学生丧失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是普遍的现象。而这种丧失，有多半乃是自我放弃。更发人深思的是，这种自我放弃，有着十分堂皇的自我支撑理由。理由一，领袖。毛主席是永远正确的，跟着他，自然用不着我们自己去独立思考；理由二，主义。这些主义既现成又权威，有此打头，自然也用不着我们自己去独立思考；理由三，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天然合理，顺着潮流，不会出错；理由四，派性集体。集体行动有声势，出了事也有集体挡着，法不责众。

既然文革是大家没有经过独立的思想、不是以各自独立的人格而进行的，那么，文革的惨重后果也用不着由大家中的哪个人来负责。文革是错误的，但是，它的参加者却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错误。错误在谁身上呢？当然在领袖身上，在主义身上，在运动身上，在集体身上。每个人自己呢？是上了当，受了骗，“众所周知的原因”，“违心地”怎么怎么了。

这不是很好吗？这么一来，大家不是就可以“将矛头集中指向‘四人帮’”，“轻装前进”了吗？

对此，我却十分担心：这种“没有独立思考、没有独立人格、人人没有错、人人不负责”的社会是十分可怕、十分危险的。万一什么时候又刮一阵什么风呢？

万一又出一个什么“帮”呢？再把这个社会乒乒乓乓地捣个稀巴烂后，大家“轻装前进”再出发吗？

文革中的血腥暴行，个人应不应该为之负责？为了间接说明这个问题，我想先讲一个美军的故事。故事发生在 1968 年 3 月，与清华百日武斗差不多同时，地点是越南的美来村。美军一个小分队的凯利中尉指使士兵杀害几十名越南平民，这就是著名的美来屠杀事件。当时有一位直升飞机驾驶员汤普森少尉，见状奋起制止屠杀，他拔出手枪，站在美国士兵和越南平民之间，怒声吼道：“你们敢再向越南人开枪，我就向你们开枪。”事后，汤普森少尉由于他的道德勇气，获得英雄的称号，而凯利中尉却送到军事法庭受审。对凯利的审判，在全美国引起了一场热烈争论：凯利该不该对美来大屠杀负责？审判进行了四个月，筛选陪审员就化了三天时间，因为大部分陪审员候选人预先就表示凯利无罪。审判中，辩方律师和不少证人也坚持认为凯利无罪。一位资深的军事法官，挺身为凯利鸣不平，他说：“这个年轻人的错误是我们制度的产物。政府迫使他离开家，发给他武器，教他去杀人。然而同一个政府，却对他进行审判，并挑选了法官、法庭和起诉人！”最终，凯利被判终身劳役，不久后，减刑为十年。大多数美国人赞同法院的判决，虽然他们痛恨发动越战的上层政客，认为这些政客才是美来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但他们还是认为，毕竟政府并没有指令凯利可以随意屠杀平民，作为一个公民，凯利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凯利一直不服判决，但是刑终出狱后，不久前在一起聚会中，他终于说出了郁积在心中四十多年的痛苦和忏悔：“我错了!!!”

我经常用这个故事来对照、反思我们的清华百日武斗，隐隐觉得，我们清华大学的有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公民责任心和道德良知，似乎还远不及美军的几位下级军官。在血腥暴行中，我们缺乏像汤普森少尉这样的具有道德勇气的英雄，却有几位像凯利中尉这样被判有罪的同学。凯利中尉在四十年后萌生了良知，衷心忏悔。而四十年后的我们呢？个别武斗策动者还在振振有词地说，《倒下的英才》中第二部分，唐金鹤所叙她所亲身经历的种种让人撕心裂肺的武斗惨状，“不过是些花絮”；两方在东大操场的长矛对阵，是“游戏心态”；策划 530 大战，我不做，别人也会做，等等，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思想，是清华大学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放弃了独立思想的

清华知识分子，是失去灵魂的知识分子。文革期间，我们许多人迷失了灵魂，处于精神的病态之中。在法律中，处于精神病态中人就丧失了责任能力，是无需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法律责任的。文革刚结束时，为了作法律辩护，如果有人说“由于当时我失去灵魂，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责任能力，所以对自己做过的一切无需负责。”或许还情有可原。问题是，四十年后的今天，已经不会再有任何人来追究什么法律责任，不过是提议各人反省自己的公民责任罢了，这些清华同学还要大肆反对，这无异于对公众宣称：“为了躲避这份公民责任，我拒绝找回自己的灵魂，我情愿继续留在精神病院里，一辈子做一个没有独立思想、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责任能力的人。”我真是很遗憾哪！

国内有些学者将文革期间青年学生中普遍丧失公民责任意识的原因，溯源于刘少奇的“做党的驯服工具”造成的影响。对此，我很同意。但是，我痛心地注意到，虽然文革后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早就完全没有市场了，而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中缺失公民责任意识的现象，并无改观，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现在不少人公然鼓吹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为了个人的利益、钱财和官位，可以无视一切社会责任。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汶川大地震中丢下学生自己抢前逃命的“范跑跑”。这位北大毕业生似乎很向往美国精神，他一再宣称，他的行为是天经地义的，而反对他的行为的人，则是文革遗毒没有肃清的伪君子。

我在美国公立高中供职已历十多年，以我的实地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中小学教师不会出现“范跑跑”。在美国中小学里，经常进行防火演练，有时一个月里都要举行好几次。演练时，警铃响起，课堂上不管老师讲到哪里，实验做到哪里，一律马上停止，由老师带领全体学生经由指定路线，有秩序地疏散到教学大楼之外。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说，至少对这一点，美国教师早就养成习惯，一定会照料学生疏散，而绝不会自顾逃命。这是美国中小学教师必须做到的基本职业责任。

我们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的根子之一是，在我国教育中对个人主义这个概念，长期存在错误的理解。要不是把个人主义批得臭不可闻，要不就将个人主义视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最高信条。其实，人类个体是认识外在世界的基础，公民个体也是任何社会的基本，公民个体更是现代社会自由民主的基础。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个人主义也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什么是高层次的

个人主义？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提倡的，也是我们清华传统的灵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这种个人主义的主导下，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负起自己的公民责任，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总之，以我的理解，做人要做出自己这个人的品牌来，这才是真资格的个人主义。

台湾学者李敖先生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中说：“个人主义的真精神”的“特征有两个，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将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的思想信仰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今天我们反思文革，就应该倡导这种“有独立思想，并为自己的思想、行为负责”的个人主义。

重建我们这个民族的信仰和人性道德观念

文革中的非人性行为和血腥暴力事件，人们已经揭露得很多，批判得也多了。文革过去四十年了，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怎么样了呢？非人性的行为和血腥暴力事件，是不是就不见了呢？我相信，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国内的大多数人，包括海外的大多数人一致认为，目前中国社会陷进了空前的信仰道德危机。贪污、腐化、色情、诈骗，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常态。毒大米、三聚氰胺、地沟油、贩卖儿童、砍杀小学生、西太平洋博士门，等等等等，一次又一次冲击着人们越来越麻木的神经，一次又一次拉低了人们能够承受的社会道德底线。有识之士在惊呼：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了，已经到了必须反省、正视、重建我们这个民族的人性道德价值观念的时候了。

有人认为，中国的道德问题都是文革弄坏的。对此，我不甚同意，因为它无法解释：在彻底否定了文革、“拨乱反正”以后，为什么中国的道德水平会再一次急剧下降了呢？甚至，我有一个看法：中国的道德危机部分原因，是不加“剥离”地、全面地否定文革而造成的。大批官员的腐败，是全盘否定了群众对当权干部进行揭发和监督的权力以后，才开始的。社会风气的恶化，如色情、唯利是图和挥霍，等等，也是把原来教育中正面肯定的许多基本道德，通通当成落伍思想，或文革余毒加以抛弃以后，才开始的。

但是，我还是愿意从反思文革的惨重教训中，寻找中国道德危机的病灶。

病灶在哪里？我认为，病灶还是在于评价一个人物、一个事件的标准上，也就是说，这个标准是“人性为本”呢，还是“政治利益为本”？我发现，无论在文革中，或是文革后，中国社会上都有一个放在绝对第一位的东西：文革中，这个绝对第一位的东西是政治，有道是“政治压倒一切”嘛，为了推行社会主义，为了政治正确，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有人振振有词地去做，而且无所不用其极。文革后，这个绝对第一位的东西是经济，有道是“发展是硬道理”嘛，为了推行资本主义，为了个人发财，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有人振振有词地去做，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可叹的是，无论在文革中，或是文革后，这个放在绝对第一位的东西，都与人性和道德无关。没有一次说过“人性压倒一切”，也没有一次说过“道德基准是硬道理”。

在文革中，也不是完全不讲道德标准，只是它的道德标准主要是按政治立场和路线来划分的。只要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正确路线”一方，这就是“大节”，其余一切，都是“小节”。如果站错队，立场反动，那么不管你的品行操守如何，都是“伪君子”，“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我读过巴金给他侄儿写的一封信，其中的两句话，我感到有一股震撼的力量，愿意奉为毕生圭臬。巴金说：“人各有志，重要的是做人。”是啊，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应该有独立思想的权利，他可以信仰这个主义，也可以信仰那个主义，可以持这种政治观点，也可以持那种政治观点。当然，他也可以按自己的理解和志向，自由选择政治营垒，“各为其主，尽力划船”。只要他的政治主张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只要他的行为不逾越道德规范，那么，他的人格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在美国历史上，有一名将军最受公众敬仰，他是美国国内战争时期的南军总司令李将军。尽管李将军打输了，投降了，并且历史证明，他所服务一方的政治主张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一百多年来，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十分崇敬李将军。美国人民敬仰的不是李将军的政治立场，而是他的道德、他的人格、他“做”的这个“人”。

我们的社会是由一个一个的人构成的，最重要的当然是人。所以，从根本上说，“做人”、“对人的关怀”和“发掘人的潜能”，才是“压倒一切的”、真正的“硬道理”。

在文革中，也不是完全不讲“做人”和“对人的关怀”，文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造就共产主义的一代新人”；我们天天在“学雷锋”，背诵“为人民服务”，立志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应该说，当时我们大多数人对这种提倡是态度真诚，也确实愿意身体力行的。但是，文革中，不少人一面高喊“斗私批修”口号，一面打人、制造恐怖血案。文革后，人们往往将当时的这些口号，当成笑料，弃之如敝屣。今天的中国，一直真诚抱着这种信念的人究竟还剩几多？！

当时提倡的这些“新道德，新风尚”是完全错误的吗？为什么它不能长久存活呢？我认为，有些提倡本身并不错，但它有基因上的内在缺陷。

一是割断传承。除此而外的中外道德准则，统统批判打倒。号称伟大创新，其实谁也跳不出三界之外，这种理想不过是多种中外文化的精华和糟粕的揉合体；

二是陈义太高。极高标准“大公无私”和“禁欲”，恐怕只有极少数先进分子或修行者才做得到，拿来要求芸芸众生一律遵办，结果只能使很多人违心“做假事”、“说假话”；

三是强迫改造。文革中某些人拿一些自己也做不到标准，竟然使用侮辱他人的人格尊严、甚至肉体暴力的行为，强逼着别人去做。这种做法与西方中世纪的宗教迫害，无太多差别；

四是与阶级斗争理论共生。那时最响亮的是“为人民服务”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两个口号，我们被教导的是“对人民要亲，对敌人要狠”。但“人民”和“敌人”的界定标准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常常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拉帮结派，残酷整人，打击报复，踩着他人的脖子往上爬，等等现象，是有些单位的常态。

即便有这些内在缺陷，我还是认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能否定。新的道德观念，不能在“一会儿全盘否定那个，一会儿全盘否定这个”的信仰真空中冲虚而出。剥离掉那些割断传承、不切实际和不讲人性的成份，我们当时的道德教育并非一无是处。不久前，有一件事给了我深深的感受。

这就是，曹景仲同学的迁葬。曹景仲是谁？他是曹聚仁先生的长子，清华大学冶金系六八届学生。唐金鹤在这本《倒下的英才》中专门写到了他，是他帮助

唐金鹤撤离武斗中的清华园，书中也讲到他不幸牺牲的事情。但是，曹景仲没有参加武斗，也不是在清华武斗中死的。毕业后，他分在张家口，参加试验炸药的工作，雷管爆炸，因公殉职。对他的死，曹聚仁先生十分哀痛，写了一篇文章，讲曹景仲继承了他祖父的品德，又讲到曹景仲在牺牲前曾被炸伤眼睛，回上海疗伤，未待伤好，再回张家口试验才遭的难。对此，我十分感动。今年一月，曹的家人将曹景仲的遗骨迁葬到上海龙华公墓，他的父母亲坟墓的旁边。我特地拟送了一幅挽联：“家传忠信 三代人行状数来 海内学林同仰慕； 国失英才 四十年音容记起 清华校友尽衔悲。”我想借此告诉世人，不能只看到清华武斗中个别人的血腥暴行，还应看到，我们那一代清华学生中还有一种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这种献身精神是有价值的，它是中国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不能轻易否定。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叫“普世价值”的名词，我不知道它的确切含义。我理解的有一种“普世价值”，倒是早就客观存在的。人类文明从开始到现在，各个民族，各个地域，各个发展阶段，各种宗教，一代一代的智识大德，一代一代的圣贤之士，都是在提倡一个相同的道德价值观。这就是：把他人视为同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对幼儿的爱护，对弱者的怜悯，对所在社会集合体的忠实和诚信，等等，总起来一句话，人性为本。这种价值观，在我们中国文化中触目皆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佛家也好，没有不阐述这个普世价值的。回想起来，我们那个时候，学校里天天讲的是“世界观”和“人生观”之类的东西，没有“价值观”这一说。说实在的，价值观这个词，我还是在美国中学的教科书上才学到的。而且，美国中学的教科书好像没有民主政体是“普世价值”的说词，至少，我没有看到这么说的。那么，他们教育孩子们树立什么价值观呢？我看的那些书一连串开列了六、七个，负责任啊、诚信啊、道德勇气啊，纪律啊，等等，也还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这些东西。今年美国国庆长假，我们驾车去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去旅游参观，海军官校成立快两百年了，它们校训是三个词：责任，荣誉，忠诚。我以前去过西点陆军官校，记得他们的校训也差不多是同样的几个词。看来，这才是美国朝野最推崇的价值观。

我认为，这些貌似简单、了无新意的道德准则是每一个社会的基础，也是重建我们这个民族的人性道德价值观念的基础。

不得不说的几句话

前几天，唐金鹤给我发了封电邮，她说：

“六十多岁的我们，今天重提四十年前的往事，为的是什麼？为了爭四十年前的谁对谁错？为了爭那个属于四十年前的荣辱？年近 70 的我们，早已跳出这些狭隘的框框，个人的荣辱對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用？我們是爲了真实地记录下这段历史，为了认真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使中华民族再也不能重蹈我們的复辙，这就是我们一写再写的目的。”

我很能理解唐金鹤写这段话时的激愤心情，她在写作出版和修改再版《倒下的英才》的过程中的遭遇，受到的种种的讥讽、漫骂和攻击，真是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的。文革中过来的清华大学的精英嘛，批起别人来，一贯总是振振有辞的。要想让他们反省和反思，是这么容易的吗？不管你的事实多么确凿，不管你的感情是多么的真诚，不管你苦口婆心地想要表达什么思想，他们可以用“派性”两个字就将你的一切全部抹黑。

我本来也是，总以为事实和真诚能够打动什么什么人，总是说寄厚望于什么什么人。现在我明白了，文革在好多人的心灵上的负担是沉重的，我们这些在文革中没有太多劣迹的人，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很难体会得到的。反思文革要靠内心良知，要靠各人自觉，这实在是无法勉强的事。

有感于上，在《倒下的英才》再版之际，我再抄录李敖的一段话与唐金鹤同学共勉：

“四十年来，胡适被穷酸文人的浮议骂惯了，他才不在乎这些。有的甚至写下洋洒千言的专书骂他，他只觉得好玩。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只要有东西，不怕别人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我要给他补上一句，只要我们负责任，不怕别人拿不负责任来骂我们。”

【争鸣】

陆小宝“剥洋葱”的误区

沈 昆

（一）文革反思不能剥他人的皮，包裹自己的核心

陆小宝“剥洋葱”，自称来自“1999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钩特·葛拉斯”，赞曰：“在得到诺贝尔奖的崇高声誉后，葛拉斯冒着千夫所指的危险，自曝其秘。其道德勇气令我肃然起敬。”

然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却如叶志江所说，“钩特·葛拉斯是剥自己的洋葱，流自己的泪。陆是剥别人的洋葱，并愤然于别人没流泪。”诚然，在陆小宝这篇后记中，没有看到如同他为唐金鹤的《倒下的英才》所写的序那样，公然把他含有盐分的泪水洒向别人剥开了的伤口，应该是一进步。但是陆小宝却绝对不是对葛拉斯的跟进或效仿，不是“自曝其秘”。陆小宝期待的是团派同学“自曝其秘”，以便探讨“团派一方所犯的暴行”更多更严重之“原因”。陆小宝所赞赏的唐金鹤所揭露的血腥暴行在清华这一前提下，当然也可以称其为“自曝其秘”，都是清华人所为嘛。然而，按照陆小宝至今仍然在团、四之间标记分野的做法，那就不能称之为“自曝其秘”了，倒像是迟到了四十多年的“控诉”。唐的书不仅没有自剥自己那一半洋葱，而且多方打包装扮，甚至连科学馆里的虐待（包括女性）暴行，刻意杀害许恭生同学这样的恶性事件都企图轻描淡写地加以掩盖与辩护。

如果陆小宝确有诚意剥开自己那一半洋葱，“自曝其秘”，不过苦于习惯了自以为“唯我正确”的道义审判者的身份而忽视了自己人那些丑行的话，我倒是愿意做些提示。

当年武斗之时，414 的某些人制造了很多谣言，把老团描绘成“杀人放火”的匪徒，甚至在武斗结束后仍然坚持并进一步散布这些谣言。比如，先是造谣说老团用消防车往科学馆喷汽油烧了科学馆，骗过了美国友人韩丁，以至写进了韩丁的书（《清华大学百日武斗》）；后有沈如槐，三十多年后仍然执迷不悟地把自己的谣言写进自己的回忆录，说什么老团用消防车喷汽油烧毁了九浴室；再有所谓“530”毒箭，这本是一个很容易证明的问题，然而 414 的始作俑者们当年就拿不出证据来，却硬生生坚持到去年（我现在并不确定这些坚持“毒箭”说的人们去年沉默之后是否真的放弃了）。这些谣言是怎么出炉的，是否也该把伪装剥去，曝曝其秘呢？陆小宝是否也可以反思一下，414 当年是否就是依靠这种把老团描绘成匪徒的谣言强化四派同学特别是武斗队员的仇恨心理，以至造成了许恭生同学倒地受伤后还必欲置之于死地的严重后果？是否正是这种以谣言为基础

的仇恨教育维系了 414 相当一部分人对团派同学的阶级歧视心态，甚至连已经定居美国多年的陆小宝至今对这种阶级歧视仍持“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见陆小宝为唐金鹤《倒下的英才》所写的序）？

还有更加恶劣的所谓“轮奸”事件，有还是没有？已经被人写进纪实文学，甚至被文革研究者作为案例引用，不可谓影响不大。更重要的是，如果真有这种败类混在我们之中，我们绝对有责任“清理门户”。请陆小宝显示一些责任心来，在当年据守主楼的同学中推动一下，调查一番，把这层“洋葱皮”剥开。

本人孤陋寡闻，414 究竟还有多少秘密有待自曝，恐怕不在少数，414 的干部党员多，熟知如何应对“向党交心”的诀窍，核心秘密一直包裹着，事实证明，在这一方面老团是无法望其项背的。工宣队进校后，老团很快就“自曝其秘”，几乎一切罪行与过错尽在工宣队掌握之中，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同学受惩罚甚至被判刑。老团那些臭事，大概百分之九十都已曝光，而 414 呢？大概百分之九十还在层层洋葱皮的包裹之下。如果说 414 像洋葱，需要一层层剥去辣人眼睛的保护皮才能见到核心的话，老团则像核桃，一旦成熟掉落到地上，那层皮肉就会摔得粉碎而使其果核暴露无遗。

当然，当我说老团就像核桃掉到地上，果皮碎裂而果核暴露无遗了，也只是说老团曾经是整肃的焦点，老团的所作所为包括各种错误乃至罪行大体都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仅如此，甚至还有不少“事出有因，实无其事”的诽谤与污蔑也都经由迟群、谢静宜之流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压在老团的头上了。因此，尽管我与陆小宝的目的出发点不同，我同样呼吁原来老团的核心人物们不要让自己见证过的历史轻易流失，更不该忍见谬种流传。

（二）对文革合理的总体判断是正确反思文革的前提

反思文革的第一步当然是还原真相，厘清历史，虽然“真相”与“历史”在不同人们的眼中可以有很大差异，但经过讨论与反复的还原，我们应该可以接近真实。

在拥有了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才可能对文革进行更深入的反思。然而即便面对基本事实，也不见得能够正确地反思。几十年来，我们缺乏对文革正确的反思，对许多已知的事实也仍然存在尖锐对立的看法，就是明证。若要正确地反思文革，

无论是制度层面的反思，还是文化层面的反思，前提都必须以世界潮流为背景，认清文革中各种诉求的正误之分，才会对文革做出比较正确的反思。如何分辨文革中各种诉求的正误？方法之一是把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分别与世界潮流相对照，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诉求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

根据上述思路，不难看出，文革的主要成果就是导致了中国发生巨变的改革开放，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官民矛盾，而毛泽东所设计的解决方法就是给人民以民主权利，给人民以发言权，监督权，以及推选代表参政的权利，当然，毛所设计的“无产阶级民主”是在“正确思想指导下的民主”，因此这一“民主”在一开始就无法避免思想专制的结局，也必然落入政治专制的陷阱。另一方面，文革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必然把官民矛盾夸大为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也就只能寄希望于“七、八年来一次”的不断折腾了。

清华的团派思潮代表了拒绝回归“十七年”的诉求，同时在夸大官民矛盾的前提下又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使自己陷入了两难境地。⁴¹⁴思潮大概看到了夸大官民矛盾的不合理性，因此主张在经过小打小闹的修补之后回归“十七年”的主张。回归“十七年”看起来比“七、八年折腾一次”更为稳妥可行，但是经历过文革之后，“十七年”的老路不可能再重复了，回归“十七年”老路的选项已经被历史所否决。因此，在反思清华文革时把注意力放在谁胜谁负，谁优谁劣这类重启历史性文革争端的问题上，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只能表明“反思者”仍然身在云里雾中。

清华两派的思潮虽然都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就没有理由求全责备。

文革以前，经过诸如 1957 年的反右等多次政治运动，经过学生中的思想革命化，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思想樊笼，人们普遍习惯于以当局的说教代替自己的思考。文革打破了这种局面。无论是认为文革的领导者“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也好，还是认为毛泽东鼓励思考（当然是在正确思想指导下的思考）也罢，总之是把自由思考的孢子从密闭的魔瓶中释放出来了，尽管还有无产阶级专政下思想专制的重压，尽管还有服从正确思想指导的紧箍咒，这些自由思考的孢子总是会扩散。总要发育，潮流一旦形成就无法阻挡。文革才是国人思想开放的起点。

清华文革两派的思潮正体现了当年的清华人突破思想樊笼走向独立思考与

自由思想的最初步伐。如果考虑到当年那按照《修养》的原则营造的精神枷锁之沉重，以及经过“十七年”来的“罢黜百家，独尊马列”而造成的思想资源的贫乏单调，加之时刻需要担心触及当局所设红线的战战兢兢，清华人当年所作的思考，称得上弥足珍贵。很显然，如果以今日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去加以衡量，当年清华人的那些思考显然是幼稚可笑甚至不乏荒唐之处（诸如期盼中央表态解决清华两派的争论，诸如以为清华武斗不出三天中央就会表态，等等）。然而，这种以今日的状态标准居高临下地审视四十几年前的人与事，指责他们是“放弃了独立思想的清华知识分子，是失去灵魂的知识分子”，岂非与三十年前的世纪大审判的闹剧殊途同归？都是以今日的存在审判过去的不存在，却完全罔顾今日的存在恰恰是从往日的不存在中生长出来的这一事实。

陆小宝认为，“文革中，青年学生丧失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是普遍的现象”，又说，“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思想，是清华大学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请问陆小宝，有没有搞错啊？不是在文革中青年学生才丧失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早在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中，青年学生就被训练成为缺乏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螺丝钉”与“工具”了。作为清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思想”也早在1957年的反右之后就被阉割、被禁闭了。恰恰是在文革中，在毛泽东“关心国家大事”的旗号下，清华人开始艰难地重拾“自由的精神与独立的思想”，许多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如果陆小宝果真如此看重“自由的精神与独立的思想”，那么否定那阉割和禁闭“自由的精神与独立的思想”的“十七年”，就完全是合乎道理的了。果如此，我们如今倒是可以就此达成共识了。

（三）文革前“十七年”是文革之“恶”的根源

然而，陆小宝显然没有认识到文革在否定“十七年”方面的深刻意义，因此才会认为青年学生在文革中丧失了原本在经过“十七年”的思想禁锢后已经不复存在的“独立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也正因为视“十七年”为美好时光，陆小宝的“剥洋葱”才会仅仅剥到文革为止，而绝没有继续向纵深剥下去，查查“祖宗三代”的愿望。正由于陆小宝轻忽甚至无视中国社会在文革前的“十七年”所发生集聚的弊病（特别是制度性弊病），低估了文革否定“十七年”，开启改革新

路的决定性意义，必然在“剥洋葱”时发生诸多“时空错乱”的错误判断。

文革作为“革命社会主义”或者“暴力社会主义”（周泉缨语）的终极试错，作为由“十七年”到改革的转折关隘，浮现出来的种种“恶”，大都可以追根溯源到“十七年”甚至更加久远。文革中体现的顺应时代潮流，利于社会进步，于人民群众有益的种种诉求，则往往只能以粗浅幼稚的形式显现，有时甚至不免荒唐。

比如现在为人们深恶痛绝的“整人”现象，并非文革的“专利”，不但在“十七年”当中就已经反复出现，而且可以追溯到中共建党之初，连整人的方法大致都是相通的，大概可以总结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传与苏联肃反的混血种。人民群众实际上对这类“整人”运动存在着内心深处的反感，当文革把整人运动推向极致，“整人”在大范围内普遍发生时，人们往往以游戏人生甚至起哄调侃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这种反感与反对。

再比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思想禁锢问题，美国友人李敦白的经历极为典型。李敦白早在美国加州上大学时就参与工人运动，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二战后期，李被美军派遣到昆明担负美军与中国民众的民事纠纷调解工作。在他调节的一桩美军士兵驾车撞死中国女孩的案子中，中国底层民众所受到的欺压以及中国社会的不公平深深地震动了他，使他决心投身帮助中国人民的活动。在日本投降、二战结束后，李敦白设法以联合国救济总署巡视员的身份留在中国，力图通过做好救济工作来帮助穷苦的中国人。在他的联合国救济总署巡视员任上，李敦白了解到更多中国社会的黑暗以及西方国家助纣为虐的行为，而他在中共的根据地（李先念所部）则看到了中共领导下的民主与公正。因此，在内战大规模爆发之后，李敦白辞去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职务，在宋庆龄与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到达延安，开始正式参加中共领导的解放运动。在到达延安大约一年之后，李敦白在1948年加入中共，成为加入中共的第一个美国人。由于李敦白所具有的美国人那种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加入中共后最令他难以理解与打扰他的就是要在思想上与“党”保持完全一致，几乎任何出自个人的考虑都是不被允许的，李敦白对于刘少奇的《修养》一书也无法理解，认为怎么可以把人当成工具。最典型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炸弹扔在李敦白住的窑洞旁，把他着实吓坏了，他狂奔了很远跑到一个偏远的村子里躲了两天，等他缓过劲儿来回去之后，在党

支部里受到严厉的批评，没有任何人对他表示同情。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开始尽力压抑自我，以至在 1949 年身系冤狱之后，仍然认为党组织怀疑他必然有原因，因而竭力反思自己任何可能的错误。从李敦白的经历，我们看到了一个富有自由精神与独立思考的美国人怎样自愿地进入了中共的思想牢笼，当然这一过程中存在外部（党支部的同志们）压力，但这种压力并非强制，而是说服你，让你心悦诚服地作出自愿的转变。文革开始后，李敦白感觉到思想上重新获得自由，认为这才符合马克思所论述的共产主义，这才是中国革命应走的道路：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解放为基础的。然而，李敦白这一段心情舒畅的日子也没有持久，很快又因间谍嫌疑系狱。（李敦白与清华文革也有渊源，据李敦白对我讲，李磊落与他熟识，曾在 1967 年初〔？〕找过他，要他到清华劝说蒯大富改正一些错误做法。）

我想，我们当中很多积极参与了文革的同学，大概都有类似李敦白从延安到文革那段时间的心路历程——艰难而曲折但追求思想自由的初衷难改。当然，文革开启的思想解放，在最初阶段还是非常低级的带有很大局限性的，仅只是打破了直接包围束缚我们的若干层网罗，在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的更高层网罗——对毛泽东的迷信，对马列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迷信却仍然存在。因此，我们那个时期的思考仅只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束缚下的思考，还远非完全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但确实带有个人独立思考的印记，这也就是产生多种派别思潮的原因。当时思考缺乏独立性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期待中央表态的依附性，这在当时是不可能认识到的。我们在思想解放的心路历程中的飞跃性变化，对很多人而言，1971 年的林彪事件是主要触发点，另一些人则以毛逝世后“四人帮”的垮台为触发点。思想解放与突破思想桎梏（包括传统的与姓共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以今日“自由精神独立思想”的广度与深度来谴责当年学生思考的缺失，显然是脱离历史实际的，难以得出有益的教训。

（四）发生文革武斗的广义原因

至于清华的知识“精英”竟然会在文革中摆出中世纪的战斗架势互相拚杀，今日看来确实荒唐，但在当年两派各自独立的思考争执不下而只能期盼中央表态

解决的情况下，发生武斗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清华发生武斗的原因，笔者已在拙文《反思清华百日武斗——兼评〈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中有所探讨，现将发生文革武斗的广义原因概括如下：

- 中国具有推崇使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的传统，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以武力解决政治争端的历史。中共掌权后更是不遗余力地宣扬“枪杆子里面除政权”，“战争是政治的最高表现”，等等。武力解决政治争端的思想在文革前就已深入人心。

- 中国社会没有摆脱“弱肉强食”的兽性，崇尚暴力的现象在中国根深蒂固，极其普遍。试想，对一个在家庭争执中都经常使用暴力的社会，怎么可能避免群众中的政治争端引起的暴力现象？

- 文革爆发前几年，出于国际政治斗争环境的影响，中共开始大力宣扬“斗争哲学”，使我们那一代人崇尚斗争轻忽妥协，因而在文革两派争端中不愿意妥协，偶尔达成妥协也会由于民主程序不健全而被少数固执己见者毁于一旦。例如，清华的团派与 414 派双方领导核心曾经在 1967 年复课闹革命时达成了大联合与成立校革委会的协议，但在 414 派下一层级讨论协议时被单方面否决，使协议泡汤。

- 作为政治起家的政党，中共在文革前“十七年”大搞政治挂帅政治第一，以至全国泛政治化情况严重，任何认识上的不同都极可能被政治化，并进而上升为阶级斗争的表现。泛政治化外加夸大阶级矛盾的结果使妥协解决矛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 由于几千年来封建君主统治的影响，外加中国人口众多，中国文化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对个体生命的轻忽与对集体的过分尊重与服从，中共执政之后更是在全国人民中不遗余力地推进压制个人考量发扬集体主义的宣传教育，以至青年学生普遍接受“为了革命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生命”这样的观念。因此，一方面可以为了本派的利益或维护所谓正确路线不计个人生命的安危而参加武斗，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了尊重“群众运动”以及“发动群众的需要”而容忍对批斗对象的暴力，接受被批斗者做出的牺牲。

- 中共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大力宣传阶级仇恨，所谓阶级教育很大程度上就是鼓动阶级仇恨的教育。由于泛政治化与夸大阶级矛盾，文革两派的分

歧往往被视作阶级对立的表现，如果对方组织结构的阶级成分比较复杂，就会成为煽动阶级仇恨的目标，广西武斗中发生对广西“422”派的屠杀，湖南的道县屠杀，都带有明显的煽动“阶级仇恨”的印记。

● 1966年北京8月“红色恐怖”的大规模暴力，开文革中有组织暴力行动之先河，其榜样作用不可低估。有理由相信，当权派的男女衙内们发动“八月红色暴力”正是企图“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清除的东西，拿到文化大革命中来左右文化大革命”，以便“断送文化大革命的”（引自陆小宝为《倒下的英才》写的序）的“请君入瓮”之举。

上述各点构成了当时中国社会因政治分歧导致暴力的根本原因。因此，文革中两派的武斗，特别是清华武斗的发生，决不是由于少数人好勇斗狠的结果，也绝不是群众组织少数头头个人意志的体现。

当然，我在这里指出当年发生武斗的大背景与深度原因，并非拒绝反思我们自己的错误，而只是想指出无论我们个人对武斗的认识对错，都无法跳脱时代的局限性。陆小宝引用蒯大富的话说，如果当时蒯大富“主张不打”，“那场武斗（百日武斗）肯定打不起来”。但是蒯大富忘记了一点：他当时不可能主张不打。设想蒯大富在1968年4月23日414准备把旧电机馆建成第二个科学馆式的武斗据点时可以“主张不打”，就如同设想1968年的春天414可以实践非暴力运动一样荒谬。

我在反思文革武斗时强调促发武斗的上述广义因素，当然不是否定参与武斗者的责任。我只是想说明，武斗当然是错误的，甚至即便在武斗时就有相当数量参与了武斗的同学认为武斗是错误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但由于文革前政治思想的积淀，在文革当时的大环境下，清华两派争执与对立发展到1968年4月时，武斗已成必然之势，除非中央不吝放下身段公开表态介入清华问题（但也不能保证被批评的一方是否就会接受中央的表态，武汉百万雄师事变就是明证）。

（五）中国公民社会的缺失以及社会道德伦理系统的虚妄

如果不能正视我们当年犯错误的必然性，就只能堕入“文革受骗上当论”的陷阱，而这显然不符合历史真实。脱离了历史真实的文革反思，既不可能在反思者的思想深处触发质的飞跃，更不可能为后人留下切实有效的借鉴。

尽管陆小宝正确地认识到“从教育上反省文革暴力”。但是，他所谓的：“教育上最严重的问题……是过分强化意识形态，而对普通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严重缺失”，就出现了错位而有些不知所云了。

文革前的教育岂止是过分强化意识形态，完全是为中共的意识形态服务的，对于这一点，中共在文革前从来是不含糊的。而认为“对普通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严重缺失”则没抓住问题的实质。文革前的“十七年”，公民教育不是缺失的问题而是受到打压的问题，道德教育则并不缺失，只不过进行的是一种虚幻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改革之后，中共的教育倒是不再强化意识形态了，公民教育仍然缺位，公民社会的发展仍然受到压制；道德教育尽管逐步增加了传统道德的因素，然而对照社会上大量官员腐败的现实，难免被受教育者当作虚伪的说教。

中共专政统治的实质就是包办一切，因此容不得公民组织的建立，也就容不得公民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自行组织从事某项事业是不被允许的，必须经过中共的组织，最后可能实际上还是群众在做事，但必须纳入中共的领导之下。我在初中时曾有一次发现一位同学家里经济很困难用不起学校规定的作业本，我就买了一些送给他。不知怎么让班主任知道了，把我找去谈话，虽然说我帮助同学的想法是对的，但又指出我应该依靠组织，抛开组织自行行动则带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连这类同学之间互相帮助的小事，中共都要纳入其组织的轨道，群众本着自己意愿参与社会及国家大事，当然就更不被容忍了。因此，我以为，文革前的学校不仅没有公民教育，中共的各级政权与组织还出于尽量垄断一切社会事务管理权的心态，千方百计地压制与防范民间可能出现的任何独立的公民性活动。

倒是在文革初期，一方面由于中共各级组织的瘫痪，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召唤，人民群众才开始突破以往的束缚，尽管在总体上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体，在具体的地区、部门或单位等较小范畴内人们确实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内获得了行使公民权利的机会。问题在于，由于上述原因，国人显然缺乏作为公民所必需的训练，更加之缺乏完整的民主程序，人们对于公民的责任之理解更是狭隘偏颇的（只知对国家与集体的责任与义务，不知对其他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因此，一部分人行使公民权利往往是以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公民权利为代价的，其结果必然导致更多的纷争与混乱。而且，由于不懂得公民的义务与责任包含着尊重与维护他人的公民权利这一重要组成部分，在他

人的公民权利受侵害时不闻不问甚至助纣为虐，人们在文革中获得的局部公民权利很快也就丧失殆尽了。

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会留在学校里参加武斗？根据我自己的心路历程以及当年对周围同学的了解，我以为确实与我们当年对责任与义务的偏颇的理解不无关系。正因为我们以为有责任关心国家前途，应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因而要把两派的争执弄个水落石出，正是这种责任感，加之对本派组织的责任感，促使我们（包括一些反对武斗的同学）留下来参加了武斗。“不诉诸暴力”虽然在当时就是我做人的原则之一，但这个原则显然要服从更重要的对国家与集体的责任，正因为如此，尽管我很怀疑“清华武斗不出三天，中央就会表态”的判断，但本着为文革尽自己的责任而不当逍遥派的宗旨，使我留下来参加了武斗。相反，如果我们对公民责任与义务的理解是全面的，如果我们多一些对自己得失的考虑，如果我们拥有维护他人权益的意识，如果我们认为个体的权益是集体权益的基础，我们多半不会参加武斗。我们当中许多人后来受到的惩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这种失衡的责任心心的惩罚。

陆小宝显然没有分清丧失公民责任心与责任心失衡的区别，因此也就难以发见现今“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中缺失公民责任意识现象”“越演越烈”的原因。其实只要对文革进行过切合实际的反思，就不难看到，年轻一代日益严重地丧失责任意识的现象恰恰是对我们那一代失衡的责任心受到惩罚的反动。现今对青年学生的“公民责任教育”无非还是文革前那种偏重一面的说教，只提对国家集体的责任，却无视对社会中个体的责任。这种瘸腿的说教在文革一代的前车之鉴对照下，只能成为空洞的废话。因此，在当局继续压制与阻碍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的情况下，年轻一代除了选择个人主义，还能指望什么呢？

至于文革前“十七年”的道德教育，当然并不缺失。只不过当时宣扬的是所谓“共产主义道德”，世上本无共产主义，哪里来的“共产主义道德”？有人可能会声辩，“共产主义道德”就是“无产阶级道德”。什么“无产阶级道德”？我们进过工厂下过农村了解了真实的工人农民之后，不难发现，所谓“共产主义道德”或者“无产阶级道德”无非是按照政治需要对人类几千年来的美德筛选之后的集合物而已，这里原本就带有一种虚妄性质。1963年开始的对“道德继承论”的批判更使“无产阶级道德”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谓道德的阶级性使得

“仁爱”、“互助”、“团结”、“扶助弱小”甚至“诚实”、“正直”这些人类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美德都带上了“阶级性”：只能对无产阶级发扬这些美德，若对资产阶级亦循此道则会被扣以混淆阶级界限、敌我不分等种种罪名。其结果就是在区分阶级的借口下把同情之心变硬，化为冰冻之心。

人类产生伦理道德观念的最根本原因是人类本能的模仿能力，以及由此而来的同情心理。由于模仿能力而形成对行为方式的约束，这大概还可以追溯到某些动物，哪里与阶级有什么关系？人类的道德伦理观念是人性善的体现，是高尚人性的提炼。因此，把阶级性强加于道德伦理，势必泯灭人性。那么，随着文革当中“无产阶级道德”的虚妄性暴露无遗，随着泯灭人性的种种“恶”行在阶级斗争与革命的旗号掩护下大量浮现，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系统的崩溃就难以避免了：虚妄之物必然不能持久，崩溃之后就是道德真空。

目前要重建中国社会的道德伦理体系，我同意陆小宝的看法，首先要以“人性为本”。也就是说，要摈弃以往那些虚妄的说教，还道德伦理以人性的真面貌（2008年汶川地震，在抗震救灾中涌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我的一位同学在电子邮件中颂扬这些是“共产主义道德”的结晶。我回复他说，这些美德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就是在千年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时就已经大量存在了）。就应该从党政官员们首先做起，衡量一下是否够资格做人，如果连做人都不够格，那就别提什么“代表三个先进”了。只有中共痛下决心，清除混进党内的那些连做人都不够格的人渣，只有给各级官员确定人民群众认可的道德底线，并交由人民群众监督，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才有可能。

我们批判“共产主义道德”、“无产阶级道德”的虚妄性，并非否定在这两面虚妄的大旗下面我们当年所接受的诸如“助人为乐”之类具体的道德观念。恰恰相反，充分肯定这些历经几千年提炼与传承下来的人类美德，就必须为其正名，必须使其摆脱共产主义乌托邦的阴影，摈弃莫须有的无产阶级属性，恢复其普适的价值。事实上，任何阶级的成员，都只有通过接受多种形式的教育才可能继承与发扬历史传承下来的人类美德，无产阶级也不例外。无产阶级分子如果不接受人类高尚的道德伦理观念，不接受人性向善的行为准则，同样只会沦落为人渣。文革中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以及广西发生的屠杀惨案中，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

全部是贫下中农无产阶级分子所作所为，就是明证。

综上所述，无论是文革中我们这一代人显示的“瘸腿”的公民责任感，还是被阶级性冲击，侵蚀了的人性与道德伦理观念，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文革前的“十七年”，而造成这一情况的制度与思想文化层面的樊笼至今仍然存在，我们这一代人之所以会积极投身于文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們内心深处萌动着突破这一樊笼的愿望，不管是自觉的还是朦胧的。

（六）结束语

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中国社会大转变的关头心灵挣扎的一代。许恭生同学的悲剧就是这一挣扎的典型之一，许恭生同学在教练刺杀时总是嘱咐大家不要刺要害，避免致人死命，自己却成了清华百日武斗中唯一被长矛刺死的受害者。今年四月底回清华参加毕业四十周年的班级同学聚会，了解到同班同学一桩四十几年来一直不为人知的往事，一桩类似陆小宝所赞赏“美来屠杀”事件中汤普森的往事。我们班的L同学，在清华武斗中行事颇张扬，人称“唐·吉诃德”，武斗中小有名气。1968年“727”那天与一部分没有按照团派总部指令撤出学校的团派同学（据说有两三百人）一起参加了营救在9003大楼被工宣队拘押的同学的行动，在他们冲进9003大楼后，L同学身边一人（不知是否清华学生）刺伤了一位工宣队员，而且举起长矛还要再刺，L同学极为愤怒，当即用长矛对准那人：“你要再刺他，我就刺你！”制止了那人。四十几年来L同学从未在我们之中提起过，这一次由于我坚持要了解“727”细节时才提到的。大概，L同学从来也没有认为自己那是什么英雄行为，而宁愿把那个年代的一切都埋藏在记忆的深处。

我相信，除了极少数生性残暴者之外，绝大多数参加武斗的同学在剥开自己的文革“洋葱”时，都会发现心灵深处在人性与暴力之间挣扎的痕迹。我们反思文革，如果把极少数人泯灭人性的残暴行为不做区分地当作文革积极参与者的主流行为，显然既不符合历史真实，也必将堕入陆小宝也极力反对的“妖魔化文革”与“全面否定文革”的陷阱。而大量的社会现实表明，现今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正是吞噬了“妖魔化文革”与“全面否定文革”的苦果的结果。

进一步认识和研究“蒯大富现象”

——要宝钟著《蒯大富》序

唐少杰

大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蒯大富。而这个名字，对于当代青年则很陌生。然而，正如苏共和中共党史上的“日丹诺夫现象”、“周扬现象”一样，作为一个政治符号，蒯大富和他所代表的思潮和运动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文革故乡，不仅对于文革历史以及文革重大问题的研究门可罗雀，格外萧条，而且对于文革历史重要人物以及文革时的政治风云人物的探究也是噤若寒蝉，视如畏途。这些状况和做法与文革的深刻教训和深远影响远远不相匹配，也无助于更好地反思文革、更有力地防止人道灾难重现。显而易见，对于文革历史中众多重要的或著名的人物的历史角色和历史地位，或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或妖魔丑化，那就无法理解文革的复杂性、深切性、广泛性和独特性；也就很容易把一部文革史，按照毛泽东当年批评文艺界的那种说法，归结为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少数人摆弄甚至玩弄的“帝王将相”史。

在研究清华大学文革历史之际，我总是在思考着这么几个问题：究竟是谁人造就了“蒯大富现象”？究竟是何种力量促成了“蒯大富现象”？究竟是什么东西中断了“蒯大富现象”？在我看来，至少应该十分明确的是：“蒯大富现象”不是蒯大富一人造成的，而是文革发动者、领导者与文革广大群众共同造就的；“蒯大富现象”也不是文革一时一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68年的政治文化与群众运动互动并进的结果。因而，“蒯大富现象”就绝不是仅仅涉及蒯大富一人的以及与之相似的“蒯氏人物”的现象，也绝不是只关乎清华大学文革一隅的现象。

那么，什么是“蒯大富现象”呢？简言之，“蒯大富现象”是以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蒯大富为代表，响应号召投身文革运动，

由文革最高领袖鼎力支持并且由各行各业的草根大众身体力行的，在“反修防修”大目标下反歧视、反迫害、反权威、反现行文化体制的“造反运动”。

从要宝钟先生所著的本书中，不难看出，“蒯大富现象”的内涵大致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首先，“蒯大富现象”是文革伊始工作组与群众斗争问题的一个焦点。具体地说，这一现象关系到文革如何发动、如何进行和如何深入的大问题。质言之，“蒯大富现象”的萌发和出现，表明了1966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屡试不爽的政治运动及其模式在文革开始阶段的危机和转型，特别是凸显了这种政治斗争机制及其经验在文革爆发之际的失败和破产；表明了文革不同于以往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运动的最深切、最显著的一点：文革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所谓大革命。“蒯大富现象”在文革最初的运动中可谓所向披靡，高歌猛进，进而，间接地亦即从群众的层面上终结了刘少奇等人所主导的、工作组所执行的整治、迫害群众的“反右”式的路线，直接地亦即从历史的契机上凝聚了集文革“上帝”、文革马丁·路德式的民众改革家和文革世俗君王于一体的毛泽东与难以计数的文革群众息息相关的“契合”。要宝钟先生在本书所说的“开坛不讲蒯大富，读尽文革也枉然”，其道理主要就在这里。

其次，“蒯大富现象”是文革造反派问题的真髓，是文革初期造反派运动的一面大纛。造反派问题和造反派运动，不仅比红卫兵问题和红卫兵运动更加深刻、广泛和重大，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尖锐和棘手的群众问题和群众运动。正如要宝钟先生在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文革造反派，在实践中反对仅仅根据家庭出身，在政治上把公民分成三、六、九等。主张所有合法公民都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平等权利和平等的社会地位。正因为如此，所谓‘蒯派’在清华一直被对立面攻击为‘痞子运动’。……平凡、平等的诉求，反对打击群众、反对特权的主张，唤起了中国社会中下层广大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动摇了官僚阶层‘是人民利益代表’的‘道义’和权威，冲决了当权派的思想政治战线。原来被视为‘思想落后’甚至‘反动’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现在成了理直气壮的革命者；而那些所谓的‘革命前辈’，一向有权给别人定性、划左中右的领导干部，现在却再三再四地当众交待自己执行反动路线的罪行；那些贵族红卫兵、官办红卫兵现在反而不如平民红卫兵、群众红

卫兵革命。总之，建国十七年以来形成的先进与落后、是非与曲直，一时都被造反派打了个人仰马翻！”

再则，“蒯大富现象”是文革群众运动及其历史的一个症结。文革的发动、普及和深入在一定程度上是借助于“蒯大富现象”及其类似的力量来进行的。“蒯大富现象”的意义是直接凸显出了文革运动的群众性，至少是文革初期运动的“全民性”。一方面，文革运动的缘起、文革势力的因子、文革领袖的动机、文革群众的运作、文革初始的异常、文革初期的机制直至文革自身的独特和文革特有的缺陷，都会在“蒯大富现象”中体现或折射出来。另一方面，文革作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它所固有的群众的本性和追求、它所形成的群众的“定势”和“惯性”、它所展露的群众的分化和思潮，它所独有的群众的“专政”、“武斗”等“暴民政治”，乃至整个文革群众运动失败的命运和夭折的归宿，也可在“蒯大富现象”那里得到反映和阐释。本书的一个长处就是要宝钟先生在对蒯大富文革初期的历史活动进行相对比较细致的梳理的同时，既对蒯大富及其所代表的文革群众作用做出了恰切的、合理的评价，又对蒯大富和其所主导的一些文革群众斗争给予了具体的、肯綮的批评。

最后，“蒯大富现象”是毛泽东文革异化和自我异化的一个凝结。我个人认为，从蒯大富本人在文革中的兴衰和结局到“蒯大富现象”的裂变和终止，不只是蒯大富一人的厄运，不只是文革广大群众的不幸，更主要的是毛泽东本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蒯大富现象”都凝聚有毛泽东的文革目的和文革手段之间无法协调的“张力”（*tension*），都散发着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文革实践之间不可适应的“悖论”，都映现出毛泽东的文革阶段和文革过程之间“南辕北辙”的“矛盾”，都积淀了毛泽东的文革动因和文革结果之间相互否定的冲突。

诚如要宝钟先生的结论所言：“从某种角度看，从某种意义说，不是别人，正是这位毛泽东先生，又亲手掘开坟墓、亲手埋葬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别人，正是这位毛泽东先生，在历史舞台上推出了文革造反派，然后又很情不自愿地把他们推向了万丈深渊。”

不仅如此，毛泽东先生最后也把他自己置于了文革的不归之路。虽然蒯大富在文革历史中只不过在头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显赫一时，“蒯大富现象”也只不过

在这两年里逞强作势，但是，蒯大富问题和“蒯大富现象”实质上是贯穿于文革全部历史和根植于文革主要方面之中的。即使四十余年过去，在文革故乡，无论怎样，我们都很难说，由毛泽东本人所作用的这类问题和所引导的这种现象已完全过时或销声匿迹。

本书作者要宝钟先生在文革初期与蒯大富本人的体验和观点有不少相似之处，这使得作者以饱蘸同情的或理解的笔触来描写本书的主人公。全书行文流畅，情节跌宕，富有文采。更为重要的是，本书作者能够站在相当高的历史点上、以相当广阔的视阈来关注和评价蒯大富问题。这就使本书根本不同于那种过去中国大陆内地出版、发行的有关描述蒯大富的作品，这些作品不是把蒯大富问题或蒯大富本人妖魔化（最典型的就是丘引著的《蒯大富演义》，发表在《中外通俗演义》1985年第一期，后收入《乱世狂女》一书，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就是把蒯大富问题以及蒯大富的作用简单化直至膨胀化（其代表之一就是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的《清华大学九十年》第269页至第275页上关于清华文革初期历史的记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前者实际上在妖魔化蒯大富的同时也往往妖魔化了文革，后者在过分夸大蒯大富的文革责任之际还从反面“抬高”了蒯大富的作用和角色。要宝钟先生所著的《蒯大富》一书所记述的蒯大富个人的历史及其事实不仅清晰、准确，而且鲜明。本书所阐述的观点不仅开门见山、不落俗套，而且有胆有识、掷地有声。尽管不同的读者可能会对这些记述和阐述有所异议、有所商榷，但是，通过这些记述和阐述以及由此而来的异议和商榷，可以说，本书为进一步认识和研究“蒯大富现象”提供了一个开创性的尝试。

毋庸置疑，本书作为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只是限于1966年夏至1968年夏的蒯大富的主要经历的写作，这与本书的题名不相匹配。本书的主要缺点在于：在历史资料的发掘和利用上还有“更上一层楼”的必要，例如，大可利用近些年来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一些领袖人物年谱和传记的有关内容以及一些著名人物回忆录的有关片断等等，来充实本书的相关章节或段落。

当然，我们不应该苛求于本书作者，因为本书在历史文献资料上所受到的限制或“局限”实质上也是整个文革文献资料（包括个人档案）研究的落后甚至停

滞的一个反映。另外，虽然本书是作者对于书中主人公几次采访后写出的，但对于主人公在文革初期的思想演变、心理特征、性格表现、精神取向等方面的描写或评述，仍然大有深化和细化的余地。

总之，在阅读了从不同棱面展现出蒯大富文革初期诸多风貌的本书之后，我们更加迫切地呼吁蒯大富本人重视和抓紧他自己的文革回忆的撰述，更加热切地希望他本人的这种回忆著作及早完成和问世。无庸赘述，这样的回忆著作不只是作为文革历史人物的蒯大富给他自己，也是给文革、给历史直至给他的后人的一份“答卷”。大约十年前，蒯大富与清华同学们聚会时，一位同学问起蒯大富那十岁左右的、聪明伶俐的女儿蒯小琼：“小琼，你知道你爸爸是文革名人的问题吗？”小琼似懂非懂地而又稚声稚气地回答说：“我知道。我爸爸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没有干好，犯错误啦！”童言道真谛！是的，不仅仅是蒯大富本人跟着毛主席没有干好革命，确切地说是没有干好文革，而且在整个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可以跟着毛主席干好文革，就连毛主席自己也不可能干好文革！在得知小琼的这一回答后，我的心情格外复杂和沉重，尽管这不是对小琼本人而来的。我自然想到了：我们这些作为或参加或体验或见证了文革的一代人，能否和怎样向包括蒯小琼在内的这一代人和蒯小琼之后的下一代人去评说文革、去评说包括蒯大富在内的文革人物呢？对此，要宝钟先生所著的《蒯大富》一书无疑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是为序。

2010年元宵节

北京 清华园 新斋

2010年2月27日

【小资料】

[毛泽东、周恩来、陶铸谈蒯大富](#)

[渔歌子 辑录](#)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8日）：

群众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是无敌的了。那样我们的头就不会稀里糊涂的丢掉了。要掌握这一点就要很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样才能提高嗅觉，明辨是非。蒯大富三论造反的大字报（注：此处有误，三论造反的大字报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所写），最后剩下一个人也敢于坚持。不怕孤立，敢于坚持，不成熟不要紧，大方向对，成熟是从不成熟来的。

陶铸（接见湖南赴京工人师生干部代表座谈纪要。1966年10月30日）：

各地方黑暗的东西很多，你们回去要斗争，要彻底揭露，不要怕，第三司令部蒯大富不是被打成了右派，现在不是成了负责人了吗？你们就要接受这种锻炼，你们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周恩来（接见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代表时的讲话。1966年12月1日）：

我处理问题从来是这样，我和左派先谈，清华我也是先找蒯大富他们谈，再找保守的谈。

周恩来（与科学院几个革命造反组织代表交谈记录。1966年12月12日）：

现在蒯大富要比聂元梓巩固得多，当然我不是说聂元梓不好，聂元梓一声炮响震动了世界，我是说聂元梓比蒯大富经受的锻炼少，我从七月份回国后经手了两个人的问题，一个是蒯大富，一个是王锡鹏，我不随便捧他们，靠你们左派奋斗。

毛泽东（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节录〕。1967年2月3日）：

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

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

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有时三百人，有时候一百五十人，哪像林彪、黄永胜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是三万多。

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

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人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

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应采取欢迎的态度，你们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方法。

还是要联合，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四·一四右的。

毛泽东（同谢富治等的谈话。1969年4月5日）：

蒯大富下放以后，表现不错嘛！

毛泽东（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的指示）：

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

以上资料均摘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编读往来】

1、[管宁/陈远焕来电来信纠错：](#)

启之《春秋大义与客观中性》中有：“俾同类史书戚戚然不敢忘其颈背。”应为“望其项背”。

2、[阎长贵纠错：](#)

58 期冉云飞文章中“凋蔽”应为“凋敝”。

3、[周津平提供北京四中教师苏亭午的资料：](#)

编者按：《记忆》第 52 期“北京四中文革专辑”中，北京四中“口述历史”研究小组写的《1966-1968：北京四中的暴力迫害》一文引用“L 老师回忆”说：“大概最开始就是苏庭伍和汪含英，这两个人是夫妇俩。苏庭伍他的历史上有一些问题，汪含英曾经是天津参议会的一个议员，但是这两个老先生解放以后都是听从政府的规定要求，在学校认真负责，但也把他们轰回去了，老家在东北，东北又找不着家，那边也不容，又把他们又轰回来，轰回来在这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无处安身了，这两位老先生后来跑到香山，在那儿服毒自杀了，死在香山了。”四中校友，北大退休教授周津平先生来信，介绍了苏先生的有关情况。纠正了上述记叙中的两处错误：一、“苏庭伍”应作“苏亭午”，二、苏曾任“国大代表”是他遭受迫害的原因。现将周先生提供的资料刊登如下：

苏亭午，1928 年北京师范大学（1929 年更名为辅仁大学）数学系毕业。毕业后曾在天津工作。1937 年天津沦陷，积极参加反日斗争。并参加由耀华学校校长赵天麟领导的反对日寇奴化教育的活动。1938 年 6 月 27 日，赵天麟被日本军方暗杀，这震惊津门的案件，使人们更加看清了日本侵略者的狰狞面目，激起了社会各界人民对日本侵略者更大的仇恨。为了缅怀英烈，天津教育界继续他们抗击日寇，抵制奴化教育的爱国壮举，并且声势较前更为浩大。张维民（卓然）、王润秋、姚金绅、杨昭思、余宗毅、崔颂芬、汪含英、张务滋、陈晋卿、袁贤能、刘乃仁、黄道、马晋恒、苏亭午、何肇葆、刘培之、沈慧儒、李陵甫等

一大批教育界爱国人士纷纷举起反奴化教育的旗帜。他们组织成立天津教育促进会，明确提出了“推行抗日教育，抵制奴化教育，促进三民主义教育”的宗旨，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着顽强的斗争。苏后到北京四中任教。

我于 1956 年入四中读高中。苏亭午是该校数学教研组长。1957 年秋上高二时苏先生给我们讲授三角课，很受同学们欢迎。他那时已经年近六旬，为了使他的宝贵教学经验得以保存，每堂课教育局都来人录音。当时他和四中的张老（化学老师张子谔）、刘老（物理老师刘景昆）并称为“数理化三老”。

1965 年我大学毕业后在唐山五中教书，给苏先生写信请教，得到他好几次热情回信。用他丰富的教学经验给刚走上中学数学教学岗位的我以极大帮助。文革开始后我们失去了联系。后来，听说他受迫害致死，但详情不知。

最近和四中的老同学聚会，才听到他被迫害致死的详情。大概情况如下：苏先生在解放前曾被选为“国大代表”，这成了他的历史问题。虽然他业务好，在四中也一直受到重用，但文革来了以后，就不管这些了。学生和部分老师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批斗，夫妻双双被剃光了头发。同时又对他抄家、封门（他在棉花胡同住）。他无家可归，暂住在四中临时给安置的一间小平房里。由于住在学校，每天都遭到批斗和毒打。他当时已经是 60 开外的老人，实在受不了了，就逃到东北找他儿子。哪知道他儿子也在挨批斗，他们夫妻只好又回到北京。由于忍受不了学生们的批斗和毒打，他们夫妻俩一起到香山公园服毒自杀。

4、[荷兰庄菁瑞来信](#)

我和那个作者李乾一样，以前也是“晚霞”的忠实读者，当年对礼平也有一种“高推圣境”的感觉，很希望他能有更深刻的作品问世。不可否认，这本小说对我的影响很大，他那些对人生和宗教的描写，为我开了一扇大门，是我这辈子看到

的第一部开启心智的文学作品。对现在的礼平，我没有评论的资格，对他的现状很不了解。如可能，希望看到更多的资料。

你们“编者的话”写得很好，回答得很妙。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记忆》就是应该如此办下去。作为读者，我支持你们。